

印度民族運動概論

陳 易 編

上 海

大 東 書 局 印 行

1 9 3 1

印度民族運動概論

編 易 陳

1931

上海
大東書局
印 行

中華民國二十年三月印刷
中華民國二十年三月出版

印度民族運動概論

△全一冊實價洋四角五分
(外埠附加郵費匯費)

編者

陳 易

發行人

沈 駿 聲

印刷所

上海北福建路二號
大東書局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九十九號
大東書局

分發行所

南京 遼寧 徐州
廣州 長沙 汕頭
北平 梧州 哈爾濱
漢口 天津 重慶

大東書局

編者小言

英國政府目前在印度的統治，把正義人道的真面目公開地暴露出來，這在歷史上還算第一次。牠拋棄了一切好聽的欺騙的名詞，公然擺出帝國主義的面孔，以飛機，炸彈，坦克車和機關槍來對待印度人民，企圖把印度永久保持在大英帝國版圖之內。英國在印度的投資達一百萬萬鎊，假定平均利息為百分之六，則印度人民每年就要被英國榨取六千萬鎊。此外印度每年輸入英國的款項還有兩萬萬羅比（印度幣名約值中國八九角）。又據英國財政專家的意見，印度軍費達印度預算百分之七十。所以印度成了英帝國主義在東方的根據地，英帝國主義是一定要盡力保存這個根據地，一刻也不願放鬆。然而惟其是英帝國對印度控制得太緊，卻把印度人民的血汗榨

乾了，他們不能再忍受了，所以自一九一九年以來印度人民的反英運動前仆後繼地不斷地發生，尤其是在最近更加尖銳化了。

西門委員會是英帝國主義用以捏造事實製造印度內亂而規定帝國主義榨取印度人民血汗的更妙的方法的一個組織。牠的報告在世界各國盡力宣傳印度天生就應該受英國的統治。所以在本書曾經以兩章詳細論之。

關於甘地主義在本書各章中都說到了，因此沒有專論甘地及其主義的一章。

北夏華事件是印度最近最英勇的反英運動，而英帝國主義的壓迫手段亦最殘酷，所謂『飛機五十餘架』『已拋彈六千餘枚』『坦克車及鐵甲車俱備』『斃敵無數』等等都是他的壓迫手段最意得處。對於這次事件本書特於最後一章論及之。

最後，編者要特別聲明的，就是本書是由歐洲的幾位著名的政論家，Karl Radek, V. Chattopadhyaya, R. Page Arnot, Burns，的著作編譯出來的。他們的政論每每影響全世界。中國的讀者諸君想亦十分歡迎罷。

編者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四日

印度民族運動概論

目次

編者小言

第一章 印度資本與英帝國主義

第二章 印度之民族改良主義與國民革命陣營

第三章 印度工人的現狀

第四章 印度農民的現狀

第五章 印度民族運動中各方的現勢

一 印教回教的衝突與民族運動

二 各派的現勢

三 印度之抵制英貨運動

第六章 西門委員會與印度民族運動

第七章 西門報告之第二卷與印度前途

第八章 最近之北夏華事件

印度民族運動概論

第一章 印度資本與英國帝國主義

目前印度發生的事件，充滿了尖銳的矛盾。英國帝國主義與印度資本之間的衝突已經開始了一個必然有利於印度民族運動的形勢。

我們在討論這一形勢之前，有舉出幾位歐洲政論家的意見的必要。首先我們要舉出魯意先生（Roy）在其所著之『印度政策的將來』一書中的一段：

『民族主義的工商業家的主要要求是什麼呢？牠們在於這三點：國家產業化，財政自主，與保護關稅。一切這些要求已經獲得了，因為英國資本力求以改帝國的基礎來克服戰後的恐慌

。經驗告訴了我們，民族主義的經濟綱領甚至在帝國主義者施行那小市民所要求的淺薄的政治改良的時候，還是能夠實現的。換言之，大工商業家對於他們的經濟發展在帝國主義政策的範圍內有了可能的一回事，得到了效果』。（原書三十三頁）

羅易先生在他的推論中，不免在尊重由英帝國主義來完成印度工商業家的要求，或由英帝國主義滿足印度資本發展的要求的根本可能。這種思想形成了種種傾向的根源，有時是重述英帝國主義的漂亮話，有時是與那些想跳過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展開的全時代的幼稚而無經驗的印度社會主義者的希望相合。例如，納拉揚（Narayan）曾經說：

『我們知道在妨礙英帝國主義所不斷努力的印度資本發展之中，工商業者漸漸地趨向於與帝國主義合作』。

印度社會主義者的這種謬見，也爲英國社會主義者極荒謬的承認了，他們過甚地誇張印度產業化的程度，又固執說英帝國主義的政策經過了根本的改變。這種謬見，已爲亞諾德（Arnot）簡單而清晰地說明了，他說：

『在金融資本時代中，逐漸發展的資本的輸出，向殖民地積極地進展着，同時在那裏（殖民地）已經有了明顯的反應力。產業發展的明顯的進程不再停頓了，更或停滯的趨向與加速的趨向之間的平衡逐漸地變成加速的形勢』。

亞諾德甚至懷抱資本帝國主義的『民族計劃』的思想，進而發生印度產業不斷的發展的思想。

我們對於這種意見是不能同意的。這是無需乎說的，任何人不會否認大戰以來印度產業發展的事實，乃至英帝國主義爲欲得到一種

妥協而向印度工業家的局部的讓步的事實。但是我們不能僅僅綜合這些事實就來作種種的推論；我們應當注意這一總的問題：英帝國主義能夠在印度資本發展之中戰勝一切困難麼？這是一個極大的政治問題。很明顯的，如果英帝國主義的利益能與印度資本的平靜發展一致，則結果會是印度不是在民主運動的時代中，同時英帝國主義與印度資本主義的發展之間的一切矛盾可以由改良主義的方法來解決。反之，工商業者逃避民衆運動是在下層民衆推翻資本主義的基礎與企圖完成平民形式的民族解放的任務的問題上，就是在總的民族反抗的初期之後，進到決定的形勢之中的問題上。工商業者放棄民族革命的這問題不能說是那個革命的結束，簡單的因爲資本家永不曾是民族運動的動力，儘管革命的社會內容是資本的發展由封建束縛中的解放。

但是如果我們否認工商業者爲革命動力的一份子，如果我們了解過去資產階級所玩的那一套逃避的把戲，而希望他們將來再來逃避一次，那麼，我們就不能矇昧地假定那妨礙印度產業發展的障礙物的排除是與帝國主義的統治一致的。因爲如果我們採取那在印度的帝國主義的統治與資本發展的障礙物的排除是一致的這個立場，那麼，明顯的，這種發展會顛覆和掃清封建的最後殘餘，會陡塞資本主義向農村進展的道路，也會以是而同時吸盡農村的無產者。這個意思就是民主革命的前途消失了，而代之以改良主義的前途。

我們不能承認這樣的一種改良主義前途的實現，這個唯一實際的討論對象，雖然印度和英國的社會主義者沒有深刻的見到，但是我們相信這種討論對於資本輸出所佔的地位的那樣平凡的事實欠明瞭，或者印度產業化的某種進展的事實未認清。

由印度民族運動的實際立場來看，中心思想是這個：英帝國主義政策的不改變可以引起那形成印度資本發展的主要障礙物的封建殘餘的澄清。百分之五十的土地是在封建的地主與印度諸王的掌握中，百分之三十在英帝國主義的掌握中。民衆肩背上的這種巨大負擔，使印度到了目前的貧瘠的土地狀態，印度每人的收入每年只二十羅比，而日本的農民卻有六十至七十羅比的收入，所以這種負擔不能由上述之聰明的方法來解決，而只能由土地運動來解決。

一七八九年八月四日法國封建貢稅的自動廢止是一個歷史的傳說。甚至基若丁派（Girondists）不會也不能解放法國的農民，而欲使農民能以肅清封建制度成爲土地的所有者，卻需要雅各賓黨的流血的行動。英帝國主義，在保護印度的封建統治之中，不僅保護了牠的直接利益，同時也保護了牠在印度主要地依其擁護的那個集團。這

不僅僅是他們的利益與封建的剝削直接地關係着的八百萬人的問題，也是全屬於制度的問題：本國國王的制度、宗教對於羣衆的影響的制度，封建制度的殘餘的一切部分。

這在本身中使我們能夠充分的說，排除印度資本發展的障礙物不會是改良主義的方法，沒有國內市場的創造是不可能的。然而還有反對改良主義前途的另一種理由。在帝國主義時期，貨物的輸出並不繼續就是資本的輸出，只是一種補助性質。大城市的金融資本——在牠手中握着許多工業，又輸出為全世界使用的物品，特別是紡織品——同時也已經發展了重工業以應日漸發達的市場的需要。這是與金融資本的需要相適應的，牠使財富的累積達到比較通常在大城市中而更高的一種利率。這個結果就引起一般使用的物品和重工業的生產品的巨額的輸出，而使殖民地國家有了創立其本身之輕工

業——牠限制大城市的貨物的售賣——和創立殖民地重工業的發展的開始的基礎的可能性。

在這個形式中，新殖民地政策——如像獨占的資本主義的，金融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政策一樣，以其輕工業優勝於重工業而與自由競爭時代的舊殖民地政策不同——不僅僅掃清了舊的政策，而且與之合而為一。因此，說金融資本主義的殖民政策在於殖民地工業發展的有力的援助，是幼稚的理論。北明翰沒有吞併南開夏。在這城市的機關，英國五大銀行的會計室——牠們決定着帝國主義的經濟政策，沒有忘記顧慮英國一般工業的利益，特別是紡織業的。金融資本不僅是銀行資本，一個與工業有別的，僅僅計算標準的利率的東西。

英國對印度的經濟政策的每個步驟，都是英國資本家的各集團中

的衝突的目標。所以，所謂印度工業發展的援助與龐大的障礙物衝突着了。衝突不僅在印度工商家與英國資本家之間爆發着，同時也在英國資本家的各個集團中爆發着了。其結果就是印度工業的發展——除大戰時期以外——進行得很遲緩。目前英國資產階級，在其戰爭要求與其革命的恐怖的壓迫之下，正在對印度民族工商業家讓步，想於將來再來取消。我們要充分地指出，英國資產階級，在欲保全印度工業的發展而對稅則讓步與提高關稅之後，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第一次民族運動浪潮失敗之後就提高了羅比的匯兌率，以是發生了英國對印度的輸出的特殊的高度。英帝國主義的經濟政策的這些發展充滿了矛盾，走了彎曲的道路，又在每個步驟中都表示遲滯和有障礙。這就是印度資本發展的需要與英帝國主義的利益之間的一種衝突。英帝國主義對於印度經濟的破壞力比較印度產

業化的過程發展得更要迅速些，這種破壞力在印度農村之日趨增高的貧窮之中與在無數千萬的巨大數目貧農隊伍的不間斷的增加中表現出來了。

就這個後者的過程的進展來看，牠不是表示印度從納貢稅解放到向英帝國主義納稅，而是牠的獨立的發生與這種貢稅的增高，唯與商業利潤之代之以工業利潤有差別罷了。歐洲資本家在美國資本主義發育未全的時候曾經貸與了借款，卻不是使美國奴隸化，而是促進牠的獨立的發展成爲最大的資本主義勢力，因爲這些借款與這個資本主義發育未全的國家的國家收入的比較，在其巨大而日趨擴張的國內市場，是微細的。就算英國資本主義在大戰以後沒有受打擊（實則已受打擊），就算英國對印度的資本輸出的程度是合乎那些代表改良主義的投機分子對印度的基本理論之一的幻想與希望，然

而這個意義還是印度對英國的獨立的加強，而非減弱。由英帝國主義與印度封建制度的利益的目前混合的情形來看，這會表示是那正扼制着印度的整個『亞細亞封建帝國主義制度』（*Asiatic-Feudal-Imperialist System*）的加強，而不是這個制度的減弱。

最後，我們無論如何不要忘記印度不是由某個歷史傾向的抽象的階級構成而使之屬於歷史的必然性，而是由實際的英國資產階級構成的；在這些資產階級的政策中，『印度官場』的紳士們，殖民地軍事與民政的官僚，那些完全與英國資產階級的統治層一氣的分子，比較一切麥克唐納爾的黨徒所佔的地位還要更重要些，縱使我們認為牠們已經證明了——我們沒有理由像這樣證明——這些最後的分子極關心於促進印度人民的地位。殖民地的官僚與官吏不僅為提高他們的薪俸而行動起來，不僅為他們逐年送給英國的兩萬萬羅比

的蓄款。在他們對讓步政策的爭論中，他們能夠舉出這樣的一些事實：例如，日本爲其艦隊與軍隊每年用了三萬萬羅比（一九二六年的數字）的時候，印度每年就對其直接與間接的『防禦』用六萬萬羅比。所以印度全部國家支出的百分之五十是爲直接的戰爭目的。除這以外還有祕密的軍事支出，如以國債的償還及鐵路的建築等爲名義，所以軍事的支出，據英國財政專家的意見，達印度預算案百分之七十。德國斯柴拉德與伐瓦勒爾在其所著之“Das Werkätige Indien”（勞動的印度）中這樣地說着：印度不僅供給牠的鎖練，還要盡力保護英國在東方的利益。印度成了英帝國主義在東方的基礎，英帝國主義要盡力保護這個基礎。

英國政府所作的一切允諾——這些允諾有些是超過地方自治的擴

* * * * *

大，或者超過印度資產階級的領袖在印度行政的增加多參加的人數——是純粹的欺騙。印度的自治屬地的解決，那就是置印度於與加拿大、奧大利亞、南美洲同等的地位，只是空想。認爲這話是真實的的保守黨的頑固分子，以及堅持反對的自由黨與工黨的黨徒，都是笨貨或僞君子。英國的自治屬地的地位實際上是獨立的小國家的地位，其中英國資本主要地建立起經濟，其中資產階級主要地是英國人，而他們的重要的特性是大英帝國擴張版圖的特性。在那裏他們如果不能保護他自己的時候（如奧大利亞之對日本），他們就對英國的對外政策承認他們的某些獨立的限度，又給英帝國主義某些特權，雖然無論怎樣不干涉他們的內政，也不供其犧牲。與已經發展了他們自己的工業的奧大利亞及加拿大比較起來，他們已經反對過英帝國主義以他們爲犧牲品來躲避其經濟危機的手段的企圖。這

些企圖就是把自治屬地與祖國更密切地聯合起來，這是破壞張伯倫 (Joe Chamberlain) 的政策，也會破壞比伐布諾克 (Beaverbrook) 與孟德 (Mond) 的政策——他們正在反對張伯倫 的努力在目前英帝國主義劇烈的恐慌時期繼續有效。在美國世界勢力的發展的影響之下的那些自治屬地，已經轉而向紐約 的金融市場了，一九二一年他們幫助了美國迫着英國解除與日本 的同盟。自治屬地已經向完全獨立發展了。印度屬地會首先表示對現在壓榨牠的不可忍耐的戰費進攻，也會發生一個印度人代替英國官僚的鬭爭。甘地 自己知道，在其對總督的最後通牒中，也在盡力地要求戰費與高級英國官僚的薪俸之百分之五十的減低，雖然人所共知的甘地 的意見是印度資本的利益必要與英國連繫地保持起來。英國帝主義在印度的統治的衰弱，會表示在印度的封建的帝國主義的地位的極度衰弱，所以將來要發生這個

問題，如果不馬上解決，至少封建的帝國主義的剝削的整個統治的制止，則印度的官僚政治的讓渡問題，只有趨於那百分之三的人民的代表參與其中的代議制之彌縫策，至少要落到改良主義的手中。成爲自治屬地的印度會表示是英帝國主義以印度十分之九的獨立賜與印度人民。以鬭爭的形式獲得完全的獨立是可能的，但是以賜與的形式授以半或十分之九的獨立是不可能的。

這是實際的情形，反英帝國主義的新的爆發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在那壓制了一九二二年的民族革命的，又在準備背叛無數的革命的印度改良主義者方面也會爆發的。印度改良主義者背叛了一九二二年民族革命，又因恐懼民族革命而制止鬭爭，他們希望英帝國主義的讓步；但是甚至參加調查印度現狀的西門委員會(Simon Commission)不爲允許。這是同樣地告訴那是英國政策的目的而非前提。英國

並不允許代表印度資本利益的印度國民會議的大多數，參加到那討論印度新憲法問題的『圓桌』會議（“Round Table” Conference）。那也告訴了我們：英帝國主義不是在改變印度的社會基礎；牠只是完全信仰封建的領主、國王、買辦階級。最後，在麥克唐納爾於一九二九年十月三十日命令印度總督、伊爾文爵士，在印度資產階級面前，擺出屬地的魔王之後，他在國會極力地宣佈——在被保守黨迫着抵西的時候——英國對印度的政策沒有什麼改變。所以歐洲諸政論家所作的這種預測每點都證明了是真實的：

『與帝國主義關係的國家的獨立——是有助於整個殖民地民衆——也適應於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但是是與帝國主義制度的整個性質不可解地相矛盾。誠然，各個本國的資本家由於他們的直接的利益大部分是爲帝國主義資本的不可勝數的細絲束

縛着。帝國主義能够直接地收買他們的大部分（甚至較前此更大些的部分），能夠創立一個確定的買辦地位，一個媒介商人，次等剝削者或對成爲奴隸的人民的觀察者的地位。但是那爲奴隸所有者的，獨占主義的上級剝削者的地位的，帝國主義就把自己隱藏起來了』。

『獨立的原則，「自由」人民的將來——這個帝國主義永不會自動地賜與殖民地的。關於這一點，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之間的利益的衝突，客觀上是根本的特性。關於這一點，帝國主義要求工商業者方面的投降』。

『本國的資本，尤如弱者，一再地投降於帝國主義。但是，他們的投降，在羣衆的民族革命的危險沒有變成直接的、猛烈的，和恐懼的時候，不是最後的』。

這是歷史所實際地給與印度資本的問題——投降或鬭爭。直接的投降是不可能的，不只是因為這會表示資本主義利益的保障的完全否認，而且因為這會表示對城市小資產階級與農民的領導權的喪失，而直接地把盟主讓與下層階級。

在下章中我再來討論印度的各種關係，這些關係正在猛烈地毀壞民族改良主義者的反帝國主義的鬭爭。

第二章 印度之民族改良主義與國民革命

陣營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二年，在印度第一次羣衆運動的高潮時期，陣營力量的分化如下：英帝國主義，是爲國王，封建的地主，買辦，高利貸者。與這些反對的是工業家，手工業者，小商人，工農羣

衆。在民族主義者，特別是甘地——他在那時第一次進入於一切印度的活動場——領導之下的鬪爭，不是爲獨立的鬪爭，而是爲印度資本家之國家行政的參加，爲在行政地位中與英國人競爭同等的權力的鬪爭。在經濟現象中，這次鬪爭是在回復過去的口號——回復原始的商品經濟（甘地之家庭紡織宣言）——之下進行着，但是實際上這個運動是取着那在其下印度本國工業發展着的情況的鬪爭的形式。甘地的門徒很不自然地提出了工農地位增進的要求。他們創立了工會，以冀接受羣衆間對於組織的加強的要求，但是他們想對這些工會傳授教育的和仁愛的習尚，又想在資本家與工人之間占媒介的地位。當工農羣衆開始不服從他們，而且劇烈化了反英國主義及反印度資本家與地主的運動的時候，甘地黨停止了他們的運動，在極正確的革命術語中具體化了這個行動。在巴多里（Bardoli）通過

的決議中（一九二二年一月），牠確定拒絕革命勢力，而在許多言辭中都說明民族主義的運動不是以破壞封建的剝削爲目的的，而是在於與封建的地主，在減輕農民的負擔的問題上，謀和平的解決。

民族改良主義那樣所採取的形勢，在一九二二年民族運動停止以後的時期中，已經改變了麼？沒有的，對於英帝國主義他們沒有改變過。在一九二二年提出了獨立的口號的民族改良主義者們，在一九二八年放棄了這個而就那保持印度對英國獨立的老奈魯（Nehru）所提出的憲法。口號的這種改變使之表現出獨立的口號對於民族改良主義只是一種獲得英帝國主義讓步的有力的手段。我們知道甘地，在獨立的口號已經在拉賀爾（Lahore）的大會接受（一月三十日之『青年的印度』）之後，在運動停止的與民族改良主義之參加『圓桌會議』的十四條之中，在諸政治的要求中只擁護軍費與高級官吏

薪俸的百分之五十的減少，政治犯（恐怖分子除外）的釋放，政治的迫害的停止，以及攜帶自衛的武器的允許。

民族改良主義對工農問題的態度有什麼改變麼？

農民運動的生長已經使民族改良主義特別地注意了；在報紙的評論中描寫了農民之不幸的地位；甘地的十四條要求有一條是地租的百分之五十的減少，但是好似一種定例的，民族改良主義者總不超乎農民地位的減輕的改良主義的要求以外。他們對待工人運動，總是公開地站在雇主的方面極不贊成這種行動，甚至贊成帝國主義所用的那種壓迫的方法。這些要求在小奈魯（Nehru）的綱領中提出來了，『儘可能地』要求封建制度的廢止（予以補救）和大產業的國家化及八小時的工作制，這些都是很明顯地如像一九一七年二月代表社會革命黨的斯科伯里夫（Skobeljev）的資本家利潤百分之百的沒

收一樣的改良主義者的實際政策。關於鬭爭的方法，改良主義者還是反對任何民族革命的羣衆行動，雖然甘地現在說着非武力抵抗的策略。在抗鹽運動開始的前數天，在他致印度總督伊爾文爵士的信中，甘地公開地曝露了他的反動的態度，他寫道：

『我們都知道暴行的黨的勢力正在擴大，雖然這時牠似乎組織不健強，意義不深刻。牠的目的和我的是一樣的，但是我深深地相信牠不是站在幫助寂靜的千萬羣衆。我比以前更加充分地意識到，只有暴行的完全放棄才能克服英國政府的組織力量。我的經驗，有限的經驗，已經表示暴行的放棄能夠是一個偉大而有力的力量。我準備領導這個力量，來反抗英國政府的勢力與暴行的黨的無組織的勢力。抱背旁觀會是同樣地把活動場讓給這兩種勢力』。

我們不必研究甘地所說的，那他的目的是與『暴行的黨』的目的是一樣的，因為我們不知道他所說的『暴行的黨』是什麼。在他的宣稱中的如何重要，就是，在革命運動的新高潮開始時，他的對兩個戰線的鬭爭的通告。我們知道改良主義的根本的政治原則自在巴多里的背叛的時期以來沒有改變過。每個印度前衛黨員，在他們的記憶中必然還留着巴多里的決議案及甘地的宣言都是站在工商業家的地位及小資產階級的富裕層的。這些東西正在極力地減輕帝國主義的剝削與帝國主義的統治，但是他們時刻沒有忘記他們是生活在工人與貧苦的農民羣衆的最深不安的火坑之中。在工農熱烈的革命開始的時候，改良主義者會不可避免地站在戰壘的那一邊去，而不再在帝國主義與革命之間。所以反改良主義者的鬭爭，是與反英帝國主義的鬭爭同樣重要的印度民族革命勝利的必要條件。

改良主義者的立場迫着他們與英帝國主義妥協，他們恐怖工農的民族革命運動，然則他們爲什麼採用一些鬭爭的手段呢？我們已部分的在前面答復了這個問題，就是說英帝國主義的利益與幼稚的印度資本的利益之間的敵對不允許英帝國主義滿足印度資本發展的需要。這迫使印度工業資產階級成爲那在某時期強烈化了他的鬭爭企圖的一個敵對派。在目前，積極鬭爭的必要已經爲民族主義的陣營中的各派進行了。

勞動階級，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二年之間盲目地服從了改良主義者，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開始與他們分離了，開始退出他們的影響。他們開始解除國家改良主義的特派員在工會的領袖地位；在劇烈的罷工高潮期——這是突破前次罷工的最高度——中，勞動階級開始形成階級，因爲這些罷工不純粹是經濟的爭議，在這些

爭鬪中他們第一次開始覺到自己是一個另自的勢力，同時開始不僅對抗英帝國主義，也對抗所謂印度社會。勞動者已經拒絕了『聖人』甘地的媒介，勞動者已經不受『同情者』的援助，因為這種援助只是對於一部分的工人——回教徒，勞動者現在已作了數月的鬪爭了；他們不再是盲目地服從改良主義者的那樣羣衆運動。改良主義者衝進工會運動中並不是沒有的事情，他們的『最左的領袖』，小奈魯，把自己裝飾起革命的面孔，以冀獲得這個運動的支配力。只要讀一次小奈魯，爲欲了解過去三年印度罷工的政治的非常重要性，在那哥普爾工會大會的演說就夠了。小奈魯不僅極力地自稱完全與英國脫離了，還稱勞動階級無須獨立，因爲英國人的統治由印度資產階級的統治代替了。革命運動的目的只能是社會主義，而這個只能由勞動階級奪取政權來實現。所以他，奈魯，是第二國際的

敵人，資產階級的小廝。所以他對於蘇聯的建立充滿了熱情。但是……他不贊成第三國際的方法，他請求展期加入汎太平洋工會祕書廳！無他。

加瓦哈拉爾、奈魯，姆替拉爾、奈魯之子，民族改良主義者的實際領袖，在工會大會中提出甘地的恩惠爲一個所謂『反對的共產主義者』，一個只是不滿意於『統治』的人。這個事實的本身表示着罷工高潮對於小資產階級給予的巨大的影響。在這樣的一篇講演之後，小奈魯會被改良主義者認爲革命陣營中的叛徒而逐出，那是可以期待的。甘地提出他的候補者爲國民大會的主席，他把他提案具體化了有如下列一段：

『沒有那個人能夠勝過他之愛他的國家；他是勇敢而富有熱情的，而現在這些成分是極必要的。但是，雖然在鬭爭中是熱

情而剛毅的，可是他仍然有政治家的理智。他，一個紀律的信徒，已經在許多事件中證明他有服從他所不同意的決議的特長。他溫和而務實際，毫不走入極端。國家在他的手中是千妥萬妥的。」

甘地，在他（奈魯）幾乎共產主義的講演之後，改變他對小奈魯的態度麼？至少沒有的！而且小奈魯，那個『幾乎共產主義者』，被選為印度國民大會的主席，結果，因他的幫助又由他在工人與民主的小資產階級的媒介制止了獨立運動。

甘地關於『暴行的黨』的勢力的生長的話，是歸因於這個事實，就是勞動階級的鬭爭所表現的事證已經覺醒了小資產階級的民族革命的傾向。在表面上，這主要地表現在那從事反帝國主義的革命的羣衆運動的少年團的急進化，也在恐怖主義運動的積極化。這我們

從報紙對於在拉賀爾的大會議事錄的記載中就看出來了，在這次大會中甘地時刻恐懼多數表決權的喪失。無疑義的，百分之一的事實都沒有傳到我們的耳中，說國民革命陣營的開始集中化，及其對改良主義的反對。

改良主義者，由其代表甘地，說出了實話，就是他們宣稱那個意思會是把活動場讓給國民革命運動與英帝國主義，如果他們制止這種勢力的行動。換句話說：他們會喪失這個運動的領導權。改良主義向鬪爭方法的轉變，不只是起於與英帝國主義互相諒解的可能，還有幾分是起於對小資產階級及目前從事實際鬪爭的無產羣衆之喪失影響的恐怖。改良主義者，在作反英帝國主義的鬪爭中，曾經希望英國人受羣衆運動的威脅，而在資產階級的鬪爭要變成危險的以前來作讓步，這是無須乎說的了。同時他們用力防止革命運動超出

他們的支配力。

★
★
★
★
★
★
★

當甘地開始抵抗鹽稅運動的時候，他大約爲這種希望所支配，就是希望他主要地會因此喚起那比較城市遭受更高的鹽稅負擔的鄉村。這會是壓迫政府的手段。但是這同時是轉移農民對地主的鬭爭。甘地想領導國民運動成爲無邊際的運動，從 *Ahmedabad* 巡行到大海。但是在這種運動的消息傳到印度有力的鄉村之前，一切的城市都起來了。

工頭爲雇用他們向他們要求一月工資爲報酬的事實，城市工人遭受不止一百次。他們遭受無理的罰款制度也不止一百次，這個制度是搶劫他們更大部的工錢，至於許多別的加諸印度民衆身上的負擔完全不算。但是勞動羣衆與民主的小資產階級在拚命地鬭爭，他們

知道抵抗鹽稅運動是不服從英國法律的一種表現，牠是代表英帝國主義的朽敗的建築物中的那個磚石，把牠搬動起來就會發生這個建築物自上至下的崩潰。廣大的羣衆運動，那些示威運動，只是爲千百萬羣衆所參加，把抵抗鹽稅運動變成了一個重要的革命事件，與改良主義的意思完全相反的事件。少微看看英國報紙在他們的咆哮中就充分地看出已經侵犯了英國資產階級的警報。反動的『晨郵報』(Morning Post)與自由黨的『曼卡斯特保衛報』(Manchester Guardian)——這是代表英國急進派的最妙的習尙——之間的不同只是音調。在『曼卡斯特保衛報』中的評論，抗辯甘地的被捕，又力說對於這樣的一個神聖修行的監禁不是處罰，又說離開政治騷動的舞臺對於他的健康是再好沒有了，這樣的論調有些什麼價值呢？格爾溫(Garwin)，他在中國革命的時候站在與頑固派反對的地位，他也反對

英俄絕交，他關於甘地寫了下面一段話：

『說到制止暴行的宣傳者，然而他同時也實際上是無政府主義的組織者，一個憎惡的宣傳者和一個流血的先驅』。（見三月四日『觀察報』）

『工黨』政府的報紙，表現着英帝國主義的聰敏，也至要地發出同樣的論調。當所謂『左傾』的布勒爾福特（Brailford）發表一篇無恥的論文的時候，對於英國資產階級的共同利益似乎是恰到好處；在那篇論文中他證明在印度所發生的事情不是帝國主義的強盜行爲，而是一種古代的悲劇。兩個英雄——英帝國主義與印度民衆——都是爲神權而鬭爭：印度的人民爲其獨立而反抗，但是英國只能放棄他的責任，否則在英軍撤回之後會發生內部大鬭爭的現象。

世界一切可笑的報紙都刊載同樣的對於抵抗鹽稅運動的自動發生

的諷刺畫：甘地撒鹽於英國獅的尾巴上，但是這獅吼了，牠的全身都感到了痛苦，那是可以知道的；一把鹽足以使那個威嚴的大獸吼特吼。這會是最大的錯誤，如果不了解客觀革命形勢的重要是由印度工人階級過去全部鬭爭以及英帝國主義的政策創造出來的，這只是因為這個運動的舵不在改良主義者的手中擺佈。如果甘地反動的傾向搶着客觀革命形勢的上風，又如果真正的革命分子因此而開倒車，則他們會替改良主義者作最大的工作。以前是國家改良主義者的信徒的工人與小資產階級羣衆，在事實上的表現，已經有了對於完全由改良主義者所發動的一種運動的革命性，也已經超出了改良主義者對於那種運動所給的限度。

因為那些同樣的羣衆，在今天拿着一把鹽示威，到了明天會攻擊鹽棧和與英帝國主義的兵士鬭爭。在工人羣衆與城市小資產階級的

革命運動的影響之下，農民運動開始發展了，印度軍隊開始潰散了。這個運動開始溢出改良主義者的支配。民族革命的陣營必然要由自己領導起來。這樣的一種陣營不可避要形成起來。每個必要的社會成分存在了。從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的運動史在羣衆中都留了痕跡。老奈魯與甘地已經迫而把他們的政策隱藏在小奈魯，這位獨立同盟的主席的後面，他的假急進主義已經要他民衆化，這個事實是證明甚至改良主義者的領袖們顧及到羣衆的不信任，那就是他們的政治經驗。改良主義者的每次叛變的行爲是幫助羣衆的政治經驗，是加速民族革命的分子從改良主義中的分化。

第三章 印度工人的現狀

印度工人的數量，有自三百七十萬至四百萬的產業工人，其中包

括鐵路工人，造船工人，煤礦運輸工人及種植工人。除此以外，有二千一百萬以上的農業工人，二百五十萬的家傭人，四百萬的商業雇員及四百萬的各種機關的雇員。

印度基本工業部門，即紡織業（棉花與黃麻），為工人最多的產業。其次為礦業與冶金業，種植工人及鐵路運輸工人也算不少，各有八十萬人以上。

大部分的印度工人所得的工資極少，甚至不足以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在一切產業部門中工人所得的平均工資，每月只有二十羅比至三十羅比（每羅比約中國八九角）。孟買的紡織男工每月得三十羅比，但女工與童工則每月祇得十六羅比。在D.P.M.煤礦中的男工每星期可得五先令（約中國三元）但女工僅得三先令。至於受剝削最厲害的種植工人所得之工資，那簡直是低到不堪想了。

有一個國際紡織工人聯合會的會員 Furtwangler，曾於一九二七年往印度考察，據他的報告，印度種植業苦力的工資是每月五羅比。在一九二二年，Assam 地方的種茶業苦力最高的工資，還不過每月七羅比。可是在這些年間，爲苦力們唯一食料的米的價格卻已不止加倍。苦力老實只好把每個羅比都用在米食上，至於衣服，說妥當些，是他們遮體用的破布，自然祇好在他們的預算中占個算不得數的地位了。

甚至熟練工人所得的工資，也祇夠勉強敷衍。約有百分之七十的工資用在食物上，有百分之十二要用在房租上。他們的文化要求，那不必提取，自是完全不得滿足的。他們雖在食物上用這樣大部分的工錢，可是若說他們可以吃得飽，吃得好，那直是笑話。早上米飯與豆粉，中午米飯或麪包與蔬菜，晚上米飯與蔬菜，這就是孟買

紡織工人每日刻板的食料。只有在星期日，才能吃到一點肉食。因此，紡織工人的平均體重只得九十九磅。印度人的平均壽數在一八七〇年爲三十二歲，到了一九二一年便只有二十二歲，而在英國（威爾斯）卻有四十六歲；這是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

拿印度工人的生活狀況和歐洲工人的相比較，就愈可看出印度工人的不幸。例如孟買紡織工人每星期得十先令九辨士，然而在英國同一熟練工人卻可得三十七先令五辨士。在其他產業中，也可看出類似的比例。

更不幸的，就是連這樣低微的工資還不見得能完全爲工人所得到。第一，每個月有很大的數目，要被當作罰款扣去，這個數目竟占至印度工人全部工資百分之八，或百分之十。工廠老闆可以利用各種口實向工人罰款，譬如說爲了怠惰，爲了非常輕微地沾污生產品

，爲了行動不敬重等等。有一大部分的工人的工資，是用爲償還高利貸債主的利息的。有許多事情強制工人非借錢不可。第一，印度工人常不能完全脫離他的鄉村及土地的關係。他們就被強制着要寄錢回家以償付重稅及地租。除此以外，城市工人還得先付一個月之房金，而工資卻不是按期發給的，大多數是受雇六星期之後才發，其目的在藉此以牽制工人不得離廠。另有一件事實，即是要在工廠或海口找得工作，其唯一門徑須先向工頭或包工經理人行賄。同時，對監工也得經常行賄。如工人不肯行賄，他就會被告發，終於被驅逐。因爲這種種緣故，便迫得印度工人祇好向高利貸債主借錢，而付他以每年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利息。印度工人平均的負債額達於兩月半工資。至女工與童工，因爲是更落後更受壓迫的工人，故成爲特別殘酷的無恥的榨取的對象，而受雇主及許多經理人監工等等

多方的剝削。

印度工人的住所也可憐到極點。孟買百分之五十三的獨身工人是完全無家的。據著『孟買的勞動及居住狀況』的 Burnett Hurst 說：『他們通常總是睡在街上，空地上，走廊上』。結婚的工人，住在小屋中，是用原始的材料，如石炭質及乾的櫟欄葉之類堆成的，房租卻極貴。據一九二二年政府的調查，每間房子的租金是每月五先令。有許多結婚工人住在營房中，那裏有許多的單房間。Barnes 博士於一九二二年調查孟買女工的居住情況，竟發見有六家同住在一間房子內，房的面積只不過十五平方呎。

資本家供給 Bengal 礦工住的住宅，許多連最起碼的設備都沒有的。窗都沒有，不必說流通空氣的裝置了。在這樣不堪設想的困苦情形中，印度的婦女居然要生育她們的兒女。不錯，有許多嬰兒有

時是在街上生產或當工作時間在工廠中生產的。許多勞動的母親被迫得祇好隨帶她們的孩子進廠。因為沒有育兒所這類機關的設置，她們無法可以離身。她們把孩子放在籃中，而把籃隱藏在工廠的壁角。那些吃奶的孩子，就只好整天在喧鬧的機器房中，塵埃底下過日子。他們所遇到的不幸的事故，自極普通。印度嬰兒死亡率之達於可驚的程度更不足怪，在孟買地方每一千個嬰兒中，死於一歲以內的多至五百七十二個乃至八百二十八個（若在英國每一千個兒童中死的不到一百七十二個）。死亡率這樣高的原因，也不難尋得。Purseg博士說，產業工人的兒童，有百分之九十八以上，是當他們的母親做工時，受雅片煙的噴吸而安睡的。

工人不識字的成分極大，祇有百分之五的產業工人能寫他們自己的名字。大概，工人的兒童是極少進學校的，因為生活貧苦，從小

就被逼迫整日作工，雖然工廠法上規定童工每日工作的最高限度爲六小時，但實際並不如此。

爲要迴避法律，使兒童終日工作起見，一個兒童，就用兩個名字而受雇於兩個工廠，這樣在每個工廠中作工六小時，一邊是早班，他一邊是夜班。

就大體說來，女工及童工在印度是非常通行的。在全部二百六十八萬一千的產業工人中，一九二一年有六十八萬七千的女工，即約占百分之二十五。在種植業中，女工數特多，大約對於每百男工，有九十四女工；在鑛業中也占百分之五十二；在碎石業中，占百分之四十二。

童工也一樣地廣受剝削，他們大部分是受雇於種植業（每百成人有兒童十九人），建築業（百分之十八），冶金業（百分之十三）

及鑛業（百分之十二）。

印度現存的工廠法與鑛業立法，自然是毫不足道。英國工黨政府的改良主義領袖 Johnston, Syme 等，曾於一九二五年調查印度工人的勞動情形，據他們宣稱，在孟買及加爾卡答的工廠中，有繼續工作至二十四小時者。又說，童工在印度是到處通行的，十八歲以下的青年，不列入正式的註冊簿中，卻另編秘密名冊，不給工廠考查員知道。大多數的企業，公然破壞現存的工廠法規，並且不受什麼處分。在印度，工廠考查的制度是異常不完全的，有許多工廠竟不受考查。

以上所述的是印度工人概況。其對於勞動階級的剝削，可謂無微不至。工人生活標準的低下，也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但在英國和印度的資本家方面，卻又是另一種想法。在目下，我們正可看到印

印度工人又將受一種新的壓迫，因為雇主正在作新的加緊剝削的企圖，謀犧牲工人來維持以前那樣高的利潤率。如孟買紗業，Bengal 麻業，Tata 鋼鐵業，Tamshepnr 冶金業以及最重要的鐵路，都正在採用合理化的政策。其結果，工作時間延長工資減少，勞動強度加甚，幾千幾萬工人被驅逐，而流落於街上。

這種英印資本家所採取的合理化剝削手段，殘酷的英帝國主義者的壓迫，以及勞動條件與失業的困苦，卻激起了印度工人的堅決的反抗。

☆
☆
☆
☆
☆
☆
☆

由上面印度工人階級困苦的情形來看，印度工人階級的活動必然要日漸擴大。然而這其中革命派與改良派的爭鬪卻日益劇烈起來。印度工聯運動領袖凱克，將去年在牙里亞舉行的印度勞工大會的

結果總結起來，寫出下面的一段文字發表在一九二九上半年的『政治家』雜誌上：

『在牙里舉行的第九次勞工大會，是赤黨的一種大勝利。他們在最重要的印度工會組織上把自己的地位弄得非常牢固，我覺得任何具有改良傾向的工會份子都無在其中存留下來的可能。妥協的限度已經達到，倘使還未超過；真正工會主義的擁護者如果想要逃開赤黨及其同情者的最後的壓服，他們就必須集合他們的力量來公開的進攻，否則只有退卻。在我們的意思，後面的辦法，倒是最合理的……』

領導印度工人從事日益擴大的經濟的和政治的運動的左派既已顯然地得到勢力和聲望，可在牙里亞大會中很巧妙地宣示了牠保障工人的利益的軍力，組織和決心，改良派分子即刻開始瓦解。

從那時起，到現在快有一年了。革命運動已經具有確定的形式。政權的爭論已經達到短兵相接的地步。鬭爭的深入引起了階級勢力進一步的分化。印度改良派既已公開的一天一天的走向反動的隊伍，出賣了民族解放運動，投降了帝國主義，這時工人顯然要獨立擔當反英帝國主義和反本國資本的鬭爭的整個任務。

真正為民族解放的左派的勢力在運動的過程中已經十分擴大，這可以從一些新工會的組織上及已存組織的獲取上看出來。同時改良派已經不斷地在羣衆中失掉地位。

見到他們一天比一天在工人運動中失勢：工人一天比一天信賴左派，羣衆所擁護的軍力漸漸的支配起全部運動，改良派分子，在過去數年中，遂設法從工聯中排擠左派分子，並且公然地挑動一種分裂，希望藉了把工人的某幾部分與左派陷絕，并組織所謂「獨立」

工會——純改良派組織，專門排斥工人戰士——以拯救他們自己。印度的資產階級當然十分贊成改良派所從事的活動，以分裂整個運動，并破壞工人階級的團結，因為他們從過去孟買의 兩次罷工中，深知道在單一的革命領導之下，工人階級當聯合而且組織起來的時候，是何等不可抵制的勢力。印度資產階級報紙所擁護的產主大會中，有一些代表宣稱他們再也用不着那些『提倡武力，破壞資本制度』的工會了。

事實上，還在納格蒲會議以前，造成分裂的問題已在原則上決定。這可以從許多印度工會運動著名領袖的言論中明白地看出來。不過凱克或者比其他的人們更爲坦白，在他那反動的機關報『印度工人評論』五月號內這樣寫道：

『至於「補救」，除了完全把我們的運動從赤黨以及他們的

活動中連帶的形式內分化出來，再無其他方法，除非赤色國際願意放棄牠用暴力來從事世界革命的洪水期前的觀念。」

現在我們明瞭凱克所提出的補救方法，他顯然是受了這次空前未有的印度工人的活動的恐嚇，印度的工人們現在不僅向他們的剝削者進攻，而且也向凱克式的一切不爲民族解放的資本家的代言者進攻。

改良派決定等待一個適宜的機會來實現他們分裂的計劃。不久這樣的機會果然到來了，在納格蒲舉行的第十次全印度勞工大會時，便提出了這樣的原則上的問題，使改良派與左派完全沒有調解的可能。（在各種爭論中有以下的問題！抵制惠德利調查團的問題與召集汎亞細亞大會的問題）。

在這已經決定分裂工會運動的時候，改良派準備好在拉格蒲會中

從事一場強烈的鬭爭。

勞西伐在他評論第十次勞工大會的一篇文章中說：

『有人要來操縱一切嗎？全印度勞工大會，在本月月底，就要遇到這一個問題，并且印度工會運動的前途如何，就全靠大會所給予的答案而定，由世界上其他部分的工會的經驗和合作而獲益呢，或採取一種階級對抗政策而鼓起工業的不安。讓我們預先戒備好來從事納格蒲各種敵對原則的試驗，到時會知道工會主義與赤黨之主義中間決無共同的論據』。

改良派分子，就是帶着這種意見和決心，來參加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一日在納格蒲舉行的第十次勞工大會。但是當他們到納格蒲下車的時候，他們受了一場冷淡的迎接，原來工人的示威顯然是敵對的。

當許多決議案提交大會表決的時候，改良派與左派就在大會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中發生一場苦鬪。雖然有改良派反對，左派終究將他們的幾次議案通過（其中有抵制惠德利調查團，聯結反帝國主義大同盟及汎太平洋工會秘書廳，脫離國際勞工局，與拒絕召集汎亞細亞會議等決議案）。當議提交大會討論，由辯論中明白的看出來這些議案爲大多數代表所擁護時，改良派由調查團委員約希和詹曼拉領首宣布退席，並且宣稱再不與大會發生關係。第一次秘密會議之後，改良派決定組織一個全國的獨立團體，脫離『某種勢力』。他們覺出自己是最少數，不能維持他們機會主義的提案，也不能支持大會的機關，驅逐工人戰士，改良派的工會官僚遂不能自行退出。不過他們始終未曾得到擁護。大多數的工會決定留在勞工大會裏邊。

在改良派退出之後，第十次勞工大會（由左派及左派國民黨，及其贊助者組成）繼續討論和表決——再度抵制惠德利勞工調查團，聯合反帝國主義同盟，退出國際聯盟的國際勞工局，拒絕召集汎亞細亞勞工會議的提議，印度民族的完全獨立等——所有這些由大會執行委員會的決議，指摘印督最近的宣言及老奈魯的憲法草案（印度自治屬地地位的概略）。

在拉格蒲勞工大會會議中，左傾的形勢是很尖銳的，原來為印度全國唯一工會聯合體的勞工大會，往常總是被反動的工會官僚所把持（約希，巴加爾，勞西伐等）。在這次大會中，關於抵制惠德利勞工調查團的決議，不但反抗英帝國主義，和麥克唐納領袖的帝國主義的『工黨』政府；而且也表示了對於那贊助以至參加調查團工作的印度工會運動中改良派領袖約希加曼拉的不信任。

全印勞工大會給國際改良派一個重大的打擊，推翻了勾結阿姆司特丹國際，和參加汎亞細亞勞工會議的提議（爲一個日本社會帝國主義者鈴木所提出），并脫離國際聯盟會日內瓦勞工局。國際改良派老早就想支配印度工會運動，并破壞工人反對外國及本國的剝削者的鬪爭。勞工大會對正式結合反帝國主義同盟，遂與國際革命的工人及各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發生關係，因而助長印度工人對英帝國主義及世界帝國主義的鬪爭。

最後，因了指斥老奈魯的憲法草案，決議要求完全的民族獨立，并在印度建立一個工人共和國，這次會議很堅決的反對一切投降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國家主義分子，因爲他已經很卑劣的背叛了民族解放運動，而贊成印度自治屬地地位。

用不着說，納格蒲第十次勞工大會中一切決議，都與印度工人運

動的將來，有重要關係。這些議案的通告，表明左派在印度工會運動中一種偉大的勝利，並且證明左派在一般工人中的勢力增加。

不過左派在第十次大會中，並沒有得到完全的勝利。在左派國家主義者的強制之下，雖然有大會執行委員會的決定，而聯絡汎太平洋工會祕書廳的議案，終究被保留到下屆會議時再討論。

左派國家主義者著名領袖波士，被推爲下屆大會的主席（自那時以謀叛罪下獄）。左派國家主義者在勞工人會中的地位大大增高，革命派不得不更加謹慎。左派國家主義者所以擁左派所提出表決的一些議案，這是誰都了解的事實。左派國家主義者，把自己裝到民族革命的模型中，極力地深入勞工運動，想從內部阻撓工人階級的民族解放的鬭爭，他們竟不惜在任何適當的機會，應用革命的語調，特別是在和帝國主義的鬭爭的問題中。他們甚至擁護外國資本案

營業中的罷工只要這是於本國資本家有利的。但當危急本國資本家的利益的時候，他們便出來反對一切的罷工工人。勞工大會新主席波士有一次在工人集會中講演道：

『爲要使我們的階級重新分裂，而公然地講論階級戰爭並且爲此戰爭而工作，在目前我覺得是一種反民族主義的犯罪行爲。當我們大家都在奴隸的狀態之下生活的時候，如果我們竟開始階級的戰爭，那真是無上的災難』。（見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四日前進報）

因爲左派國家主義者在各方面阻撓革命的工人運動的發展，並且他們那種誘惑的口吻還許欺騙不少相當部分的工人階級，所以他們是極端危險的仇敵。用盡革命派所有的力量來和他們爭鬪在現在是特別重要的。

說明左派國家主義者的傾向很好的例子，便是詹曼拉的行爲，他是退席諸人中的一個領袖。過去不久詹曼拉還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戰士。他長篇的演說反對帝國主義和工黨。在一九二八年，他還公然地退出帝國勞工會議，表示反抗工黨帝國主義的政策，並且宣稱『英國工黨，已經出賣印度和社會主義，他們的社會主義的口號，不過用來掩飾牠的帝國主義的傾向』。不過這是過去的事了。詹曼拉現在一心與帝國主義攜手了。他是惠德利調查團的一個委員，這個調查團乃是印度全體有自覺悟的工人所棄絕的。

他的叛背行爲，在分裂工人運動上算是達於極點，因為詹曼拉乃是造成這一次分裂的領袖人物。詹曼拉的行爲，對於印度工人尤其是對於革命的左派可以說是一個永遠的前車之鑑。凡是左派，應當嚴重監視左派國家主義者的動作，並且要運用一切機緣宣布他們是

工人階級運動中資產階級的代言人。

左派一定要掃除許多嚴重的障礙。受了國內工人參加民族革命運動日漸深入的恐嚇，雇主們和政府現在聯合起來以至藉了武力來消滅革命運動。雇主們直到現在還極端輕視左派工會。他們拒絕和他們談判（例如，當他們撤消對革尼坎加工會的承認時），並且要求用一種官廳的勢力來阻止他們的活動。現在已經提出這樣的問題，就是工聯運動中任何領導機關不准真正的民族革命派有被選舉權。左派的工會領袖不斷的被捕，毫無問題，改良派所造成的印度勞工運動中的分裂——此與受摧殘的戰士的逐日加多有連帶關係——將要引起對於左派的再一度的壓迫。

印度工會運動革命派當前還要有許多次大戰。牠要謹慎地保持一種極清楚的政策。左派現在用全力來發展一切可能的活動，在商店

中，在工廠中，在一切工人階級的政治的經濟的鬥爭中取得領導的地位，拒絕改良派與國家主義者左派的參加。在過去大鬥爭中所犯的一切錯誤，一定要免除。在工人階級鬥爭中一個正確的領導，和對於改良派和國家主義派一種堅決的抗爭可以幫助左派擴張勢力，並且藉着廣大的工人羣衆的擁護，可以戰勝一切不可避免的困難和阻礙。

第四章 印度農民的現狀

爲印度最大的地主的英帝國主義，侵入了印度，以前的鄉村行政及民主的農民組織便被毀壞了，然而以前的封建地主卻沒有被消除，反而造成了一個大規模的新封建制度。現在最大一部分的地主和大地主 *Samindars*（那裏大約有一百萬 *Samindars*，連家屬在內有八百

萬），即是英帝國主義在印度的主要社會支柱。實際上都已經成爲受英帝國主義支配的一個階級，這些收租人，自己是住在城裏的。大規模的農業，是絕無僅有的。介於封建喇耶，即新封建『三民大』和印度農民之間的，還有一羣教吏，剝削農民的次地租者。這種介於地主與貧苦佃農之間的中層剝削者常常有十至十二層（有些地方，層數還要多）。如果農民付不出田賦或地租，他們就成爲高利貸者的獵獲物。印度農民，約有一半是負着重債的。有時債主要把農民大部分的收穫，盡行取去。照政府的官方報告，印度有些地方，在一九一八年，發現六百萬以上的祖襲債奴——這樣的發現，只在印度能有。有人算過，地租及債息，平均要佔到農民收入的百分之七十。這點正可作爲印度鄉村中可怕的剝削的一個例證。因爲地價的奇貴，印度有許多地方是分封的田地，占了很大的比例。這種

情形之下，農民勞動生產力，自然就不能發展了。在一年最好的時季，農民也有未被雇用或只部分的被雇用的。他們收穫的報酬是很低的（麥的收成，每百阿爾只有日本收成的一半，德國收成三分之一。在一九二六年，稻的收成每百阿爾只有日本收成之三分之一）。收穫的總量從一九〇〇年以來，沒有增過。

在這種情形之下，農民的購買力，自然是無限的縮小，而他們的消費，也是很節省的了。大戰以後，農產物和工業品價格的相差，更爲不利於農民。

許多忠實的作者都說印度農民中有百萬以上的人民，是終年不得一飽。印度的死亡率，在世界上是最高（比英國差不多高出三倍）。這個高度死亡率的主要原因，直接間接是由於飢餓和貧窮，這自然要幫助流行病，尤其是傷寒症的廣布。

印度農民之這樣的痛苦必然使他們作劇烈的反抗。所以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始，在印度的各地，大農民暴動的火燄，時在這裏時在那裏高揚起來了。而這些農民運動，雖則微弱，卻已向英帝國主義的執行機關（英印政府）的，封建農奴式的，高利貸的，媒介的商業資本的和新式資本主義的諸剝削形式挑戰了。這一時期的運動之所以微弱，是由於一定的社會經濟的原因。對於這種原因不了解，常使對於農民運動發生不正確的結論。我們要明確的識『農民戰爭的重演』爲何要較印度工人的革命鬪爭爲落後，必須細味『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中對於法國小農的意見：

『耕種自己小塊土地的農民形成法國人口的大多數。在全國中，他們的生活差不多在同一狀態中，但互相間很少發生關係；他們的生產方法使他們隔離，使他們不能互相交通。這個隔

離因法國交通手段的惡劣與農民的貧困而更厲害。他們的耕地極小，因之沒有應用分工勞動，科學耕作的機會。所以在農民中，不能有進化的層次，技能的差異，社會關係的財產。每一個農民家族差不多都是自足自的，大部分的需要品生產於自己的土地上，就這樣使牠多半是與自然交換而不由社會的交通機關以取得生活的資料。所以，在這裏有一小塊土地，有一個農夫和他們的家庭；在那裏有另一塊土地，也有一個農夫和他的妻與子。由幾十個這樣的家庭集成一村，又由幾十村形成一縣。……既然數百萬的家庭，生活在那些經濟環境中，使他們的生活方法，他們的利益，和來自別的階級的他們的又都不同尋常，同時使他們多少與別的階級敵對，這樣的農民家庭就形成一個階級。但是既然這些農民間聯系僅僅是局部的，而且他們

的利害的相同也未能形成一種公衆的表現，一種國民的同盟，或一種政治的組織；這些農民家族不能形成一個階級，所以，他們不能以他們自己的名義經過議會或某種議會去代表他們的階級利益。他們不能代表他們自己，他們必須被代表』。

小農——印度的農民也屬於此——的利益，依據他們的經濟條件，必須由其他階級來代表。過去因為印度的工人沒有發展什麼運動，所以印度的資本成了農民利益的代表者。但是印度的資本，自那時以來便採取，現在也採着背叛農民利益的態度。不但如此，他還不斷地阻撓農民運動的擴大。關於這，只看下面的思瓦拉基黨的宣言中的一段就可以充分地明瞭了：

『我們很遺憾地認定，偽善者最近很熱心地想使地主脫離思瓦拉其黨；他們把事情這樣地認定，以為思瓦拉其黨沒有容納

這些老閱閱的份子的餘地。可是這些人，在過去替國家造成了許多頁數的光榮史，就是在現在可悲的時期，也製造出了許多英勇愛國之士！黨希望愛國之士消滅一般無知的同胞所有的疑慮和恐懼，使他們明瞭下面顯著的事實：凡是擁護自治的人們，無論如何不可走極端而生出那樣的一種妄想，以為應從他們的隊伍裏，把這樣重要的和有巨大影響的重要部分排擠出去，而崩潰印度社會的根基。黨對佃農的正當的處置，是很正確的，然而這種正當的處置，設若對地主是不利的時候，也真會變成可憐的』。

在這所謂奈魯——布里其特的報告中，印度工商業者很明顯地是站在地主，高利貸和貴族的方面。照這個報告，『則無論屬於誰的私有財產，都不能沒收』。

最近，思瓦拉基黨公然和印度政府共同通過保護印度高利貸和地主的權利的法律。當然，印度工商業者在努力向農民方面眉目傳情。但是不管怎樣，他們對於改進農民經濟地位的問題至今還是沒有確定的綱領，關於這點很有趣味的是，甘地在他巡行印度農村時所發表的意見。在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五日之『青年印度』報上，甘地說，他差不多在他所訪問的全部農村中，都對農民發表了下述的綱領：一，外國的商品必要排斥；二，大家都須穿本國紡織廠所織的布疋；三，無條件地爲民族的存在而鬪爭；四，必須克服印度教與回教徒的爭鬪的蔓延；五，農民不應飲酒精類之飲料；六，不應惹起階級鬪爭，一切的誤解，都應由地方的行政機關來仲裁，和平解決之。據甘地的意見，這就是解決一切土地問題的理想綱領。印度國家主義者，作一種強有力的煽動，企圖實現這些綱領。這種煽

動的一部份的結果，便是小資產階級革命的農民主義者，也同樣地沒有土地綱領，能以消除印度農民的不滿。印度資產階級國家主義者對於土地問題的這種態度，自然是不能使農民運動擴大的。

這種農民運動，現在只有在印度工人的影響之下，才能擴大起來。與農村嚴密的相連的印度工人（大多數孟買紡織工人，在罷工後，分佈在他們的農村中）的革命化必然以強烈的革命的方法，影響印度農民運動。這個正可以說明一九二八年印度農民運動的強大的發展。現在印度資產階級國家主義的最能幹的代表，也不得不承認印度農民運動的加強，照下面這一位國家主義的意見，巨大革命的引火物，已堆積在印度農村裏。例如 Radkalmal Mukerdeschi 教授，他在對加爾加大學的報告中說：

「印度農民狀態的惡化，便是印度農民革命的預兆。假使不

好生規定良好的辦法，則農民的不滿會釀成一大災禍。」（見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七日之『前進報』）

Radkalmal Mukerdschi 教授在印度『經濟雜誌』上又說：

『如不變革印度農村的整個結構，則印度社會的政治的問題的解決，更認為是不可能的。印度一般輿論的改變的表現，我在下列的事實中，可以觀察出來，即：農民羣衆的立場，愈加反映到我們的政治的及社會的綱領中。我們的注意力，更加地離開中間階級的政策，而被吸引到農民羣衆的基本問題上。不但組織和罷工出現於工業的中心地，而且農民協會及其他聯合會，也出現於鄉村中，牠們積極地對地主進攻。這種協會及聯合會，遍布於全區域。他們鬭爭的對象，是封建農奴式的貢稅與租稅的增高。這些鬭爭，大都是獲得了勝利。在農村方面，

同樣的形成了農村工人的協會，而與『伯加利』（Pezari）鬭爭，換言之，與強制勞役鬭爭』。（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之第四頁）

帝國主義者，也同樣地承認了農民的鬭爭的加強。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二日之倫敦『泰晤士』報（Times），敘述印度農民運動的擴大道：

『普通都只描寫印度農民是怎樣的平靜而對於其生活表示滿意。直到現在，還是如此。但是在印度各部，農民都是開始覺悟了。這些農民的兒子，在歐戰時候，見了許多外國的情形。現在農民也開始想到政治上的事情，他們深加考慮，他們要改造他們周圍的一切。設若我們希望農民仍然滿足他們的生活，則必不可讓農民開始改良他們的境遇』。

由上所引者，我們可以看出英帝國主義和印度的上層分子，已經認識印度農民方面對於他們的一切危險。這是當然的。爲什麼呢？因爲在最近的兩年間，農民的崛起，幾遍及全印度，而與澳大利亞的諸屬地，尤其達到了特殊的強度。在過去的一年間，強大的農民運動發生於孟買地方。這一運動帶上了非常深刻的和嚴重的性質。所以，這一問題，不獨是孟買一地的，而且是印度全國的；不獨是印度的出版物，而且是全英帝國的出版物——印度及英國——所討論的問題。不獨英印政府和印度的立憲會議，而且大不列顛政府和大不列顛國都企圖解決這一問題。特權階級，也同樣地極其活潑地說明他們對於這一問題的關係。例如，印度資產階級的代表，在孟買省以及戈圖耶拉突省的立法會議席上，勸告政府正式辭職。他們提出不信任案的理由，是因爲英印政府對於農民的處置沒有得當。印

度小資產階級，根據他們對巴多里 Bardoli地方的運動的同情，也同樣的警告。甘地召集了一個會議，給這次運動的參加者以『物質的及道德的援助』。孟買的商務局由其代表的仲裁作用，擔任了調和敵對營壘的任務。

所有這些事實，都告訴我們，英帝國主義者以及英國資產階級，都感着多大的不安。

在印度的剝削者集團內，引起了巨大不滿的巴多里運動（Bardoli-Bewegung），到底帶有什麼社會的與政治的特徵呢？

有些人以為：這一運動同印度農民沒有什麼共通之點，因為那裏的一切土地，都為這地方的高利貸和商人所有，因此只是從這些人們，而不是從這些地方的農民，徵收過高的租稅。又有些人認為：巴多里的運動是布爾雪維克所操縱的，『因為牠是為一位像革命的

人物——瓦爾耶拜，巴特爾——所指揮的。

「巴特爾先生，不願與政府妥協；他企圖在巴多里地方，創立政府，他自己想做革命者」。（見一九二七年六月四日之「每日電報」）

印度的英印工業資本家的機關報「資本」，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有下列的一段話：

「在巴多里地方，除了地方農民所組織的純粹的農業運動以外，別的沒有什麼。這裏的鬭爭，祇表演於巴多里的農民與孟買政府之間」。

這樣，我們對於孟買的運動的本質，得到了一個典型的說明。這一運動中，是一種農民對政府的鬭爭。但是在我們承認或否定上述英印資本家機關報的結論之前，必須先答復下述的問題；巴多里地

方的土地，究屬於誰？誰直接的納土地稅於英印政府？我們答復了這些問題，便也會明瞭，誰是增高的新稅的犧牲者，因為大家都知道巴多里運動的直接原因正是土地稅的增高。

事實上，巴多里地方的土地，究屬於誰？

土地所有之畝數	所有者的人數
1—5 英畝	10,379
6—25 英畝	5,936
26—100 英畝	829
101—500 英畝	40

一—二五英畝的土地是由農民所有者來耕種。這些經營的所有者，必須直接對政府納稅。凡具二五英畝以上的土地的人，普通都將土地佃於其他的農民。在一七—一八四土地所有者中，有一八九六是

地主。在一二七，〇四五英畝耕種土地中，約有三三九九五英畝歸在地主的掌握中，而這實佔全土地面積之百分之八十。凡耕種這些地主土地的佃農，都對國家不納土地稅，國家卻從這些地主來徵收。土地賦稅的增加，自然在這些地主中間也引起不滿。因此他們也積極地甚或居於領導地位地參加了巴多里運動。但因之決不能說巴多里事件，只是印度地主高利貸的反對活動的結果。反之，參加這一運動的主要力量和牠的推動力，是這地方的農民。這裏全部耕種土地的百分之八十二，屬於農民。土地賦稅的增高的主要擔負是加於農民身上。所以，他們才對英印政府作了革命的鬭爭。根據這個理由，英國資本家的機關報，才在這運動中，感着牠的實際的敵人是農民。這些農民，結局對於英帝國主義開始了革命的鬭爭。

這一運動的直接原因，如上所述，是租稅的增高。在 Rajotwari 制

度的盛行的地方，英印政府，根據他對於土地的鞏固的所有權，從一八三〇年以來便增高了租稅，而在巴多里地方，到一八九六年，才達到最後的固定。因為農民所納於地主的地租總額，在這裏較前增高了，所以據英印政府官吏的意見，政府也同樣地須得均沾一點。於是，政府所得的部分最初便增加了百分之三十。結果，地主方面的便減低至百分之二十九。但是當該地農民開始了反抗增加地稅的時候，孟買政府不得已把地租的增加確定為百分之二十二。以前，這一地方的農民，繳納五一四，七六二羅比給政府，現在他必須繳納六二〇，〇〇〇羅比。

英印政府主張：因為這裏農民經營的收穫力增加了，所以政府所徵收的地稅也必須增高。但這種主張，絕對的違反實際的情形；農民經營的收穫力不為沒有增加，而且反低下了。即英國的官吏也認

爲：在最近三十年間，已把非常高額的租稅，加於巴多里農民的身上。現在百分之八十的地稅的增高，會使印度農民甚至沒有每日一餐的可能。這正是巴多里農民之所以效一九二二年的實例而崛起的理由。他們要求減低租稅。參加這種運動的一部分農民，還希望完全廢止租稅。

領導這一運動的印度的上層階級，企圖把這一運動引導到非政治的路線。斯拉突國家主義者會議的主席說道：

『這一農民運動同印度的政治運動沒有關係，牠不是以印度獨立爲目標的一部分的運動』。

印度的國家主義者，用盡一切力量來抑制巴多里農民運動的高潮，以引導牠到一窄狹的道路，他們非但不積極地參加巴多里農民羣衆的鬪爭隊伍，反而說這一運動的發展是不適當的，進一步更同英

印法庭協議，以圖迅速來消滅牠。差不多一切印度上層階級國家主義者的機關報，都對於巴多里農民運動的擴大和加深，表示了深刻的遺憾。據他們的意見，政府的適宜的處置，可以消滅此種運動的再發。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前進報』的社論中，發表了一種意見，認為：假使孟買省政府不委託地方官廳去解決巴多里的農民問題，則這一種運動決不會爆發出來。『若孟買省政府施以最適宜的處置，則或能制止這一運動的萌芽』。

領導這一鬭爭的印度上層階級國家主義者的代表，始終盡其全力來阻遏這一運動。為達到這個目的，他們與孟買省長開談判。在他們與孟買省長的協議中，他說明他們從來沒有懷抱減低政府威信的目的。他並且說明了，如果孟買省政府能夠召集一個特別委員會來調查關於土地增稅的問題，則他們立刻可以壓制農民，讓委員會去

解決一切。

據『國士報』的意見，農民的指導者，認為必須『對於這一運動的全印度的性質，加以反駁，他們努力使牠局部化了』。

毫無疑義的，如果巴得里運動得到正確的革命的指導，必然能成爲全印度運動。因爲這一地方與其他各地方一樣，在同一的非人的境遇之下過活着。在這種條件之下，巴多里的運動，獲得了一切客觀的條件，而能成爲燃起全印農民運動的烈火的火花。但是印度資產階級國家主義者，想盡了一切方法來阻止這個運動。當參加巴多里運動的一部分人詢問甘地：各地的農民，是否能夠援助他們反抗英印政府的鬭爭？這位先生便千篇一律的答道：『擴大農民運動到其他各地，無論如何是不適當的』。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這一運動之轉變爲反抗帝國主義的農民羣

衆鬪爭的各種客觀條件，都已具備於印度的情勢之中。在印度的各地，我們都看見了印度農民之不滿的爆發。例如，在對於中央省的Jubbulpore地方，開始了公然的農民運動。據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前進報』通訊員的通訊，謂『農民已準備倣效巴多里農民的光榮的先例』。

在Maharashdar，召集了印度農民會議。據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印度國民通訊』的報告，『在這一會議上首先便討論到印度農民工人的問題』。

在不久以前舉行了羣衆的農民會議於Indiar地方。在這地方，政府官廳已徵收了增高的土地稅。這地方的農民，也崛起而反抗政府，但是資產階級國家主義者卻勸告他們不要採取此種舉動。

在一九二八年五月Strat會議之後，舉行了一個農民會議於Kair

地方。雖然農民在這時候極其忙於田野的勞動，但他們還是聚合起來討論巴多里運動。許多農民的發言者，都在他們的表現中，攻擊英印政府。他們中間有許多人說，他們必須一致的起來反抗政府。當討論巴多里地方是否能爆發農民運動時，印度資產階級的領袖，便在會議席上表現他們最壞的態度了。巴多里農民的指導者巴特爾——他也參加了巴多里農民會議——對農民說：

「我很知道，巴多里地方農民是深表同情於巴多里農民的，並且你們很想在艱苦鬥爭中援助你們的兄弟。但是現在你們不可公然地反對政府，你們只可注意於巴多里事體的順利的進行」。

印度農民革命意識的增高，使印度資本家們動員他們全部的力量來和印度農民鬭爭。思瓦拉其黨的「重新建設農村」的綱領，正是

以解決這一問題爲目標的。據總督下面之農村經濟委員會的一委員亞格爾斯說，思瓦拉其黨的這一綱領祇是在阻礙印度農民革命運動的增高。

印度農民運動之愈加帶上強大的革命的性質，單就巴多里運動的進步與發展上便可以證明了。

最初，巴多里的農民運動，在印度國家主義者的壓力之下，只採取了純粹地方的形式；農民懇求政府對於他們的要求加以客觀的判斷。但是以後農民便漸次知道這是不夠的，於是開始拒絕完納賦稅了。

我們並不誇大的說，農民在他們運動的最高形式中，已經開始了他們自身政府機關的建設。“New Service”的特別通訊證實道：在巴多里成立了兩個政府，其中一個是官廳的，另一個則是農民委員會

的形式。

『如不得到後一政府的同意，政府官廳不能得到麪包飲料和其他必要的消費的資料』。

我們看這裏農民的活動，便必然想到倫敦工人的活動，當他們在總罷工期間，如不得到罷工委員會的許可是不肯供給糧食的，印度農民已開始效法工人來同敵人鬭爭。

在巴多里運動的壓力之下，一切孟買的羣衆團體，都對於英印政府表示了不滿。孟買省的各種團體，都擁護了農民，反對一切土地稅和地租的增加。

成爲其他省份農民運動的中心的巴多里農民運動，自然使英印政府採取了一切壓迫的手段。英印政府派遣了兩團步兵騎兵機關槍隊，十二輛鐵甲汽車及飛機到農民運動猛烈的地方，這一次軍事的力量

量，都集中於巴多里的中心——斯拉突。

英印政府，被迫不得不對農民讓步。牠違反原來的目的，把土地稅的增高，由百分之二十五減到百分之五·七。英印政府以為用這種讓步可以緩和農民，但是農民運動，決不能因此而低落。反之牠越發在孟買省及其他一切印度地方加強起來了。

在這一年間，農民運動採取了更大規模和更嚴重的性質『國民通訊』登載着：『農村的不滿，在英屬領土以及澳大利亞，沸騰起來了』。

「孟買年報」說：『全國農村的不滿，都比許多人所想像的範圍還要廣大』。

在這一年間，我們見到農民組織的強大的增加，這些組織，現在向在小市民民族主義者影響之下。資產階級的報紙，都滿幅論述土

地問題危險的迫近。

所以資產階級很懂得農民對於他們的危險。甘地，巴特爾等等，旅行全國，企圖使農民歸到他們影響之下。國家主義者們對農民們說，他們擁護農民的利益。例如，地方佃農會議的主席亞利，亞曼坦，在 Jerang Molvi 區農民大會上說：

『和國民會議結合起來；這個會議是佃農與地主站在同立場上而能結合起來的唯一組織』。

這位主席更向農民說：『我們在爲自由的鬭爭中，決不能棄地主而不顧』。

英帝國主義，緊張着牠的力量，來引誘農民棄卻他們根本的利益。爲達到這一目的，英帝國主義，努力向農民做極小的讓步。根據這個理由，孟買政府，撤回了關於消滅小經濟的法案；這一法案，

正是奪去三百萬農民的土地的法案。在平加爾省，牠對佃地權作了一種新的規定。在比爾馬，召集了一個研究地租率的委員會。英帝國主義者，企圖用這樣的活動的方法，來阻止農民運動的增加以及農民運動與正在發展中的工人運動的結合。但是不管英帝國主義者和印度國家主義者怎樣努力，運動卻發展得極其強大。最近的印度報紙，便證實了這點。

新的最近的印度農民運動的性質和前期相較，有了極大的變更。以前，印度農民主要的是爲反抗土地增稅而鬪爭，現在他們卻提出關於消滅印度封建農奴制度的要求。例如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之「印度年報」報告 Ratanagarh 地方的農民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有位演說者說，印度農民的現狀，很使人回想到大革命前的法國農民狀況。這一會議通過了下述的決議：

「地主的土地所有制，無可變更，我們祇能把牠完全消滅。農民在這種制度之下，比狗都不如」。

「國民通訊」登載在 *Rotak* 城召集的 Punjab 省農民會議。這次會議通過了關於消滅大地主和私有財產制的決議案。並且決議土地稅不能用作軍費或建築新德利都會的費用，只能用來改進農民經濟。農民在他們的聲明中堅決表示，他們反對參加英帝國主義的戰爭。五月五日在 Punjab 省的 *Skinner* 地方開了農民會議，這裏在去年（指一九二八年）便已發展了高度的農民運動，牠幾包含了一五〇〇個農村。約五千農民，參加了這一會議，通過了極力反抗各種封建式地租的決議。假使封建的地主不撤消這種地租的提高，則農民必須拒絕繳納地租。這地方全體農村的農民聲明願照會議的決議採取一致的行動。

在 Runkanpore 的區政治會議上，五百農村代表出了席。他們積極的抗議對於三十一名領袖和農民的逮捕。聯省政治會議，傾其全力注意於農民運動對於農民協會的懲罰上。

在平加爾省，召集農民會議於 Kogli。這次會議的主席說道：

『印度許多政治家主張我們必須首先獲得自主，那時，我們才能開始廢除對於工農的不正當狀況；在未爭得自主以前，決不能改善階級——地主與農民——間的關係。這種意見，是完全沒有根據的。總而言之，只有藉農民的一致力量，才能獲得自主；而且只有在民衆渴想自由的時候。才能爭得自由。對於這一事件的必要條件，便是民衆對於一切不公正現象不能忍耐下去』。最後，這位主席特別激烈的說：『反對壓迫農民的封建權利。這種關係的存在，必使農民事實上轉化爲農奴』。

平加爾省，在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召集了農民會議於密明新格地方。出席於這次會議的農民代表達二千人。當時決議，農民必須開始反抗平加爾佃地法律的鬭爭。根據這個法律，佃農被迫——一旦土地零賣發生的時候——償付其地價的百分之二十。並且通過了另一決議案，『反抗各種封建農奴式的租稅及業務』。（見「前進報」）

同時，反抗榨取農民的租稅的運動也繼續的進行。例如不久以前，在巴爾塞地方形成了一個農民組織。其目的是在實行反對土地稅之百分之三十三的增高。「孟買時報」謂：五十二個農村的農民，反抗了土地稅的增高。同時該報又稱：在Daskrijo地方，發生強大反抗性的運動；在Balga地方，土地稅增高到百分之三十以至於四十，結果引起了該地的農民極大的騷動。一九二九年五月五日，農民召

集了會議，參加此會的農民代表約三千人，當時選出了一個特別農民委員會，其任務是同政府談判。可是農民羣衆卻要求積極的反抗政府。

在 Maharashtra 省，農民的不滿，也同樣的增強了，這種事實，即該省商務的主席，也不得不承認。

關於 Maharashtra 省之農民運動，「孟買時報」的某次社論說道：『一般人都承認在 Maharashtra 的農民中，充滿了不滿的情緒。他們反抗最近的課稅，召集了許多會議，在這些會議中，他們的不滿強烈地發揚出來了。該省國民運動的二三領袖以及不滿意的農民代表與 巴特爾 所主持的會議，聲言將開始有組織的行動』。

這個議論是正確的。農民在事實上，在他們自身的組織內，表示

了最大的活動來與英印政府鬭爭。農民已經決定召集地方的全體農民大會。爲達到這一目的起見，他們選舉了百七十人的組織委員會。這一委員會，又召集了各地農民的代表會議。在這個會議中，通過了許多決議，提出下述的要求：一，重新審查土地課稅的整個制度；二，不徵收增高的土地稅；三，組織一個特別機關來公正的檢驗農民的繳稅能力。除了這些決議以外，還有一個特別決議，鼓勵 *Bassian, Doigard, Bangan* 及其他各地的農民運動。大會委託他們所選舉的委員會，進行組織農民對於新土地稅的反抗。

Palgar 地方的農民，是怎樣激烈地反抗了英印政府，這我們可以從下述之「孟買時報」的通訊中，洞察出來：『在 *Palgar* 農民中，表現着一種偉大的熱忱。他們都全體一致的企圖把 *Palgar* 轉化爲「巴多里」。

約有百七十五個 Palgar 的村落，都向政府提出了對於新土地稅制的抗議。各地的農民組織，舉行一種同情的宣傳，反抗政府的租稅政策。

即在澳大利亞諸屬地內，農民運動也增長起來了。例如在 Haypore 爆發了農民的騷動。政府的軍隊。趕緊的派遣到騷動的地方。他們毫不躊躇地開始向集合的羣衆屠殺，結果，農民死者百餘人，傷者無數，此外還逮捕了許多農民。據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五日「自由」報的消息，屠殺後還繼續逮捕了農民約有四十五名。Haypore 農民運動的原因，是印度課稅的增高，而農民拒絕這種課稅的完納。

上面所述的一切事實，使我們明白地認識：農民運動一天一天的尖銳化，而起來反抗印度國家主義者及英帝國主義者的種種努力。這種情形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印度工人運動日益強烈化。有印度農

民運動的強大的增長，印度民族革命，便獲得一個合奏者，則牠的獨唱，在一切農業家國中，便會變成送死的哀歌。

據英印報章的記載，英帝國主義的買辦們，最近盡其極大的力量企圖獲取農民運動的領導權，來消滅這一運動的實際的領導。他們在各地組織了所謂『土地協會』，想藉此奪取領導權，這是一個新的證據，我們所必須注意的。

第五章 印度民族運動中各方的現勢

一 印教回教的衝突與民族運動

自從目前民族運動的浪潮開始以來，帝國主義的通訊社總存着這種印象，就是印度的回教徒始終與獨立運動無關係。而且他們張大其辭以爲影響亞拉伯及其他回教諸國的反英運動的高長。但是一切

在本年五月間累積的事實表現着羣衆騷動的非常團結。

在過去幾月中，印度的英政府，由那互助爭鬪以求獲得帝國主義行政中的位置的城市領袖的幫助，不斷地引動印度各地印教與回教的械鬪。那個衝突，自這個運動爲羣衆擔當起了之後，馬上消滅了。換句話說，因爲鬪爭中的反帝國主義的路線一出現，那許多年被封建的與資產階級的領袖爲他們本身的利益巧妙的利用了的宗教的差異，已經不能再影響了。

我們現在知道，在目前運動的形勢之中，印教與回教地主完全一致地擁護政府而反高長的土地運動，印教與回教的工業家與商業家，在工人的民族運動的影響之下聯合起來了，然而另一方面，工，農與城市貧民，並無什麼傳統的和名義的宗教信仰的差異，都在反帝國主義的廣大運動之中聯合起來了。

差不多，兩個集團，印教與回教之間在過去數年間所發生的一切鬭爭，都是在 Punjab 與 Bengal 兩省中，在這兩省，回教的人口略略超過印教的人口。有好多地方，戰爭是由封建的與僧侶反動份子所製造的，他們的奉教只是爲保護他們土地的利益的一種掩飾。但是印教，塞克教，與回教羣衆之間的團結的消息恰恰從這兩省如潮水般地傳來了。Peshawar 省的目前事件對於這些事實已經給了最後的證明，就是經濟的因數之團結勞動羣衆，比較對於封建的與宗教的首領的傳統服從更要強烈些。環繞 Peshawar 省的各村大都是回教徒，並且在革命的組織中，如邊境的「紅衣黨」與 Naujawan Bharat Sabha (Revolutionary Young League)，分子主要的是回教徒。

倫敦『泰晤士』報的通訊說：『煽動的人工性，在北方的回教中，爲孟買或 Bengal 的工人代表行使了』（這是暗指這些代表就是印

度教的煽動家)。同時五月五日印度政府公報宣告：『鼓動邊境的紛擾和煽起回教徒違反他們真正利益的參加運動，是惡毒和罪犯行爲』。但是『泰晤士』報 Peshawar 特約通訊不能隱藏農民間之土地運動的生長，這就是在五月間表現得最爲明顯的羣衆團結的實際原因。他承認宣傳家在各處找得了他們的播種的園地，這些地方正遭逢着歉收的時期，收穫的不足，以及因爲歲入制度與佃戶制度的某種不安定。

紅衣黨的組織——總機關在 Utmanzai——是新勢力的一種最好的表現，這個組織在帕撒族（西北之回教徒）中普遍了。帕撒族是一種好戰的民族，供給了許多人於帝國主義軍隊。他們對於他們的宗教的『狂熱的信仰』乃是一種普遍的事實，他們常常很容易被他們的宗教領袖所煽惑而起來反抗塞克教與印度教，這是很合乎政府的

味口的（雖然他們的宗教不能防止他們爲英國政府與土耳其回教徒戰爭）。這是可以相信的，帕撒族中之革命的宣傳必須以宗教爲根據。

紅衣黨自稱爲『上帝的奴僕』，似乎是有過的事情。入教者依着可蘭經（Koran）誓約道：遵從回教的信件，永持純潔的和宗教的生活，又如受了殘害，禁止暴力的反抗。這些誓文無論如何不是革命的。但是帕撒族村落的可怕的经济條件迫得他們作反帝國主義的鬭爭，而且素有訓練的『紅衣黨』現在正向各村進發大呼着『民族革命萬歲』！又在各村創立新組織。他們的領袖 Abdul Ghaffar Khan 被捕了，他們的其他邊境的同盟者——Turangzai 的回教徒， Fazliwahid，及其子 Badshah Gul（他們以一枝軍隊來援助）——已經在英帝國主義飛機的炸彈擊之下逼迫退到 Ghalanai 的山寨與 Matta Mughal Khel

村，紅衣黨在這些地方仍繼續他們的革命活動。

紅衣黨的這種活動對於農民和帕撒族的隊伍會有一個極大的影響。當我們認為前述之發生宗教上衝突的區域，如 Multan, Dera Ismail Khan, 等等，已經變成了那一切宗教區域都參與其中的羣衆示威的中心——那地主們的保持奉回教的農民脫離鬭爭的努力完全失敗了的城區——的時候，我們實覺 Punjab 省已經進一步地接近了土地運動。

Punjab 省的青年與較貧的中等階級的知識分子的積極參加於反帝國主義運動是表現於大會委員會的與青年組織的活動中了。大會委員會與所謂『戰爭委員會』的最積極的而堅決的領袖是回教徒，如 Dr. Saifuddin Kitchlew 與 Dr. Mohammed Alam, ——他們的被捕引起了劇烈的羣衆示威。在 Amritsar 省——塞克教的中心，回教青年聯合

會一致決議煥起一切回教徒積極地參加民族獨立運動的鬭爭。五一節，Revolution Young League 的一切支部，其中大半是回教徒，都參加紀念，舉起民族獨立的旗幟於 Sabha 的辦事處。

在 Bengal 省的情形也是同樣的。Bengal 回教政治會議，舉行於 Chittagong，一致地通過了大會完全參與農民的騷動與民族完全獨立的運動的決議案。警察曾經盡力地挑撥宗教的敵鬪，這由五月二十四日在 Dacca 的挑撥可以證明了。但是這種有成效的挑撥再罕有了，雖然危險仍然殘留着，而且可以說是這種運動的障礙。

Bengal 會議的決議完全是依照全印回教門徒與神學家聯合會 (Jamiat-el-Ulema-i-Hind) 所通過的決議案，這協會提出一個煥起全體回教徒共同參加獨立運動的宗教條文。這個宗教條文不是表示回教賢哲團已經變成革命的，而是表示他們，爲欲保持他們自己的地位永

爲宗教的領袖，不得不表示回教羣衆之不可抵抗的感情。

民族獨立運動之如何的強烈化，由Sind省的運動表現出來了，在那裏回教徒組織了全體人口的九十個Prozent。

英國政府曾經布置了『回教會議』以抗這個民族運動。很明顯的，做這個工作的走狗就是所有土地的人們。五月廿二日，布托長老（Sir Nawaz Khan Bhutto）——由這個稱號就知其爲如何人物——爲在Sukkur舉行之三個上級Sind區的回教會議的主席，忠告他的同伴（一切地主和上層中產階級的豪紳）『不要爲印度教的鬼計的犧牲品』。但是對於這位豪紳的答復是爲五月二十三日在Karachi舉行之回教徒的羣衆會議所給與了，他們的答復是贊成回教門徒與神學家聯合會之喚起回教徒參加印度獨立運動，及實行Jamiyar的綱領的決議，——在這個綱領中包含有宣傳品的散發一項。次晨與警察衝突

時，羣衆大呼其民族革命的口號了。

漢罕麥亞里與笑卡特亞里 (Mohammed Ali, Shaikat Ali) 所玩的那套背叛的把戲不能常常充分地曝露出來。由他們在 Khilafat 的煽動，他們已經在回教界獲得了某種地位；又在他們渴望在 亞拉伯諸國 (因為他們在 印度煽動這些國家的獨立) 中保持這種羣衆的信心時候，他們恐懼着正在本國發展的羣衆的獨立運動。最近在 孟買與馬達 斯的羣衆大會是他們所招集的，參加者有十餘萬回教徒，通過了擁護 亞拉伯與埃及的獨立，這同時是給與那在這些城市的回教羣衆就是那些擁護 印度獨立 的一個明顯的事實證明。

回教徒之成爲一個特別的社會的問題在產業工人方面並沒有發生過，因為在產業工人中只有經濟的和政治的因素。那造成「回教徒」的聯盟的企圖已經失敗了，只有產業工人才能打破那猶存於農民

中的宗教的迷信。

二 各派的現勢

近來報紙上關於印度獨立運動的消息很少，但是如果我們說印度反帝國主義的獨立運動消沈了，那是一個很大錯誤。反之，印度目前實際的情形由英國官場的祕密消息看來，卻表現印度各方面反英帝國主義的獨立運動更加猛烈了。

急進派方面——產業工人之為經濟的和政治的目的罷工的高漲；北方（Bengal, Behar, Orissa 諸省）農民中之抗稅運動；小市民青年同盟的急進；Panjab 及西北之 Revolutionary Youth League 之勢力與活動的加強；一般的抵制洋布與英貨的加強；婦女參加活動的發展；對英印政府的服役的共同抵制；對諸重要省分的反英帝國主義的宣傳

的擴大。總之，民衆的民族運動的日漸猛烈和非武力運動的實際低落。

溫和派方面——國民大會的領袖的防止前述諸省的拒納地租的企圖（在這些省分耕作者納地租於地主而不直接納與英政府）；主要的印度資本家與紡織業者之直接援助抵制洋布運動；自由主義的領袖及宗教的領袖和社會的少數派對於參加圓桌會議的印度代表團與印度總督之磋商；有產階級之援助帝國主義統治的法西士組織的構成；英國工黨特派員之力求獲得甘地的合作及以是之國民會議領袖在圓桌會議中之合作的企圖；在印度及歐洲兩方面之印度改良主義工人領袖的活動的擴大。

帝國主義方面——壓迫手段之漸次殘酷（兇猛地擲炸彈於西北邊境諸部落；對於示威運動之軍隊的攻擊；繼續不斷的羣衆的被捕；

判決監禁之橫蠻無理；以軍法與特別條例之兇殘的統治；報紙之受壓迫與沒收等等；對警察與鄉村官吏以薪俸之特別增高來收買；英國『公共意見』之受西門委員會的欺騙，及印度民族主義的領袖之受那引誘他們在倫敦協商的『新條文』的欺騙。

此外，我們還要注意英帝國主義的敵人，美國與日本，以英貨的受抵制為有利，而謀奪取前此為英國製造家所獨占的印度市場。

上述之各點，已經得到了充分的事實的證明，但是我們還要在這裏說一說最近發展的情形。

關於產業工人，就是改良派的領袖，也被迫而承認工人羣衆實行他們的完全自由的運動。基利 (Giri)，Bengal-Nagpur 鐵路工會的主席兼全印鐵路工人聯合會的總秘書，在 Kharagpur 工人羣衆大會之前，極力地否認英印政府所謂工人與民族解放運動是隔離的。他對

無數萬的工人說道：『在印度鐵路工人團體中的任何人知道而且深悉工人對於民族解放運動的熱情的深度』。但是他沒有說出他和他的同伴的叛徒，如 G. I. P. 鐵路工會的約希 (S. C. Joshi，他是赴內瓦的印度工人代表) 已經在那裏盡力地防止這一民族解放運動的『惡化』。

英印政府，廠主與改良派的領袖如何共同來完成這個目的，是被他們在 Sholapur 的行動表現出來了，這城市是一個工業區域，最近把牠完全置於軍隊統治之下了。棉與絲的紡織工廠的工作從晨八時至夜半三時，無休息時間，也不換班。這種布置是在於防止各廠工人聚合談話。在工作完了的時候，軍隊就禁止工人五人以上的聚合，否則處以五年的苦工。總之，對於工人製定種種殘酷的法律，以防止他們參加民族獨立運動。

一個新形勢的運動就是印度警察拒絕向示威羣衆的槍殺。國民會議委員會正對警察作特別宣傳，以鼓勵他們參加民族解放運動。

據印度加爾庫達的可靠的消息，五月初在米扎浦公園五萬人的羣衆大會中，有二百受命令向羣衆開槍的警察，不受命令，便被捕了，被送到那專爲示威者的監獄中。這次大會爲英國軍隊所解散了。二千以上的加爾庫達警察隊的警察都一致罷崗，堅持一星期之久，直到他們所要求的他們被捕的同伴的釋放圓滿解決了。

在 Bankipur，有一隊兵——內有印兵十四人，印度下級軍官一人，英國中士一人及英國中尉一人——槍殺了這兩個英國軍官，因爲其中之印度下級軍官拒絕向羣衆開槍的命令被那個中尉打死了。

因爲印度警察的不穩，孟買政府就宣布對印度警察與警官，特別是那些反帝國主義運動特別猛烈的區域的，給與特別獎金。Jalalpur

地方鄉村收稅吏的薪俸每月也增加了十羅比，並予以特別警察來保護，因為此處對於政府官吏的共同抵抗特別猛烈。

麥克唐納爾政府的在印度的恐怖政策，爲 Shalapur 軍事領袖所發布的條例表現出來了。在此處之任何人不得予飲食或庇護那些被認爲作過反政府的宣傳的人。任何違犯這個命令的嫌疑犯得處以五年之苦役監禁。乘具，財產與勞動得隨意地被徵發；不允則處以兩年之苦役。對於『認爲製造恐怖的消息』的傳布，則處以五年之苦役並科罰金。居民於一定的時間須迫而留於屋內，如有違背則予以嚴重的處罰。

三 印度之抵制英貨運動

在印度國民大會的領袖指揮抗納土地稅運動以冀保持印度地主的

利益的時候，整個的抵制英貨運動便是證明爲對於印度資本家方面的最有利的武器。

在甘地開始他的『全國』使用織布機運動——甚至他的國民大會的伴侶都認爲這種運動是退化到中世紀的生產手段——的時候，他給予這種運動以反英運動的外表的性質，以冀得到民衆的信仰。但是這個運動的實際意義有兩方面：（a）使村民閉門紡績而節省一、二羅比，轉變民族革命的空氣，又同時防止村民之到工業的中心；（b）希望創造印度的土布運動爲印度作坊業的一大興奮劑，同時增加牠的生產，也擴大印度機織布的國內市場。換言之，甘地以採用紡績機的抵制洋布運動的觀念的目的，一方面在於轉移農民對土地問題的注意，另一方面在於增加印度廠主與商人的所得。

這種情形由過去數星期的事實很明顯表現出來了。在印度棉稅案

爲所謂立法會議通過了——對英國棉織物的輸入稅特別予以優先權爲百分之十五，對其他國家則爲百分之二十一——的時候，伯納(G.D. Birla)，印度商會聯合會的會長，特別自 Delhi 至 Gujerat 與甘地會晤，蹉商土布的生產與抵制洋布的整個問題。自從伯納不絕與國民大會的領袖協商之後，那就很明顯的了，抵制洋布運動的指揮是受商人與紡織業者的委託，他們認爲甘地是他們的朋友和代言者。

所以，自然的，國民大會要幫助商人與廠主的運動的領導。事實上，國民大會的委員會，得甘地的完全許可，已經決定集中全力於洋布的抵制，而排斥那些『危險』的主張，如『抗納捐稅』，『社會的抵制』等等。紡織業家的滿足，在他們的機關報『印度紡織月報』(Indian Textile Journal)中，就稱讚甘地及其所主持的運動的幾段話。在其最後一段的言論中有下列的一節值得注意的話：

「多虧甘地所主持的運動，一個完美而慶幸的變遷在印度紡織業中才發生了。幾月以前，天氣正陰雲密佈着，工業中沒有一點起色。變遷的第一個徵候，就是廠主在 *Shah* 與甘地先生會晤的時候。：土布之不斷的需要主要地歸因於目前貨棧的空虛，存貨祇當得百分之一而已。儘管工廠中每天因為各個領袖的被捕而罷工了，各工廠目前還是興旺氣象，有些工廠正在新的鼎盛狀態之中。甚至印花布廠——前此曾開雙工趕製的——已經開始二十三小時的工作，『新商工廠』已經開始雙工，以應市場布疋的需要」。

這是關於 *Ahmedabad* 地方的情形。在孟買，『新城工廠』，埃普羅工廠以及稚哥布工廠開始作夜班，以為『供給孟買工廠出品的增高的需要』。廠主已經增加幾種貨物的價格。

與廠主有密切關係的布商，幾乎在各大城市，一致地決議抵制洋布。咖拉其正頭商會。在其決議抵制中，請求政府『在尙可爲力之時容納印度國民的正當要求』，孟買正頭商會，拉賀爾布商會，德爾喜布商會等等都作過這同樣的決議。

抵制洋布與需要土布的另一種結果，乃是在 Sindh, Panjab, 及 Unites Provinces (聯邦省) 諸省的新棉業紡織工廠的成立的增加。

爲欲增進廠家商人的利益，所謂『土布同盟』的新組織已經着手，以使其在其他方面增加專門使用土布的程度。據說這個同盟的『活動在於分離政黨與信條』。主席是伊曼教主 (Sir Ali Imam)，一位著名的英帝國主義的統治的擁護者，其祕書是他的兄弟，Hassan Imam，一位印度國民大會的熱情者。

由上述的事實看來，很明顯的，國民大會，以集中力量於抵制洋

布，不僅直接地爲印度資本的利益，同時也找着一個與那擁護圓桌會議與一個並非帶自治屬地性的新憲法的自由黨一致的共同經濟立場。

所以，抵制洋布的運動完全消滅了羣衆的國民大會的精神，同時反外國甚或反英的加強是欲欺騙羣衆去相信國民大會的運動就是反帝國主義。抵制運動的以及大會綱領的重要條款的領導權已經落到印度廠家商人的手中，他們就會很榮幸參加大英帝國的圓桌會議。那些大會的要人，如甘地，奈魯，彼特爾等等，所準備的『以榮耀的條件的和解』，乃是伊爾文爵士（印度總督）的小斯沙普魯教主——他與大會領袖討論了政治形勢之後得到這種覺悟了——所主張的。

但是，還有要說明的，就是大會領袖之防止這個運動遺留羣衆的

性質的遠圖，卻引起了大會委員會中之青年與較貧分子的更加急進。城市的青年同盟，曾經在甘地綱領影響之下，現在卻更確定的轉向於真正為民族解放的羣衆。各縣各村的國民大會委員會都正在實行抗稅運動，甚至在那些領袖們認為有『危險的』區域也正在努力於這一運動。

印度反英及牠的帝國主義敵人的運動在這裏我們也要來說一說。與增加入口稅（對英百分之十五）有關的抵制運動對蘭開夏有了一種效力。

『與雇主的會見』，曼卡斯特的紡織業報寫道，『啓示了 Blackburn 地方製造家方面的一種切望的處理，只怕要在對印度商業而工作的許多工廠會發生多數衰落之前』。

歐爾門羅得 (J. A. Ormerod)，前任 Blackburn 市長又是著名的紡織業

家，宣稱：

「這是一個最嚴重的形勢，我認爲最嚴重的形勢……這個意義就是我們的機器的四分之三不得不停止工作。……就全體來說這是對蘭開夏的一個惡劣的打擊」。他乘機加重地又說明「職工與雇主共同努力保護工業的必要」。

印度的抵制運動也是告訴德國的紡織工業（特別是撒克遜的廉價的棉織物），橫濱的絲織工業以及花邊業。關於貨棧的在印度設有日本紡織業，孟買日本總領事主張他們不要撤去貨棧。雖然日貨入口稅要百分二十，但是航船會社，如日本郵船及大阪商船會社，已決定把運到上海與印度之棉紗與棉織物的水腳每噸減一元，如此就奪取了蘭開夏的利益，又戰勝所謂優先權。

美國已經宣布了牠「對印度民族運動的同情」。同時美國工業家

已經接受大部分的印度的定貨單，這部分的定貨就是前此由英國輸入的。

第六章 西門委員會與印度民族運動

每當英帝國主義在牠所剝削或侵略的地域內感覺着困難時，或是每當牠被迫而擴張帝國主義統治的社會基礎以便獲得在牠的剝削工具裏的及牠的侵略戰爭裏的更大的本地的合作時，他總是玩一回委任個『皇家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就去『大公無私地』『研究』那事件，而復對英皇政府作些改良的『意見』。過去三年中我們看見過派出了很多的重要的委員會，這些委員會的新意見，意義上總是對殖民地的人民的更多的壓迫和更擴大的剝削。我們只需提起對東非洲的嚇爾登揚委員會，以及最近往印度的種種委員會中最重要

巴爾斯丁委員會就夠了。

在印度，英帝國主義的統治主要地依靠封建的國王，大地主，工商業家，職業與教育界的上層。指定了四種委員會，但是他們的工

作共同一致地在於尋求帝國主義統治的穩定的最好的效果。

布特盧委員會 (Butler Committee) 調查印度各封王的『損害』，這個委員會的目的是，從與新改良的印度有關的政治與行政，來劃分印度各封王所管理的區域（占全印三分之一）。印度各封王現在是被置於君王統治之下了。

農業委員會在保護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其目的是考查如何改良農業，以及給予農民以更大些的利益，以冀提高他們的購買力，使他們成爲英國工業品的最好消費者，成爲英帝國主義戰爭的最好的納稅者。

所謂惠得利勞動調查委員會 (Wiley Commission on Labor) 是爲保護工業家的利益，牠的報告是沒一點爲勞働者方面謀利益的，牠的關於勞動狀況的研究是商議如何防止職工參加印度民族解放運動與破壞工會。

至於對待民族主義的政治的代表人物——他們的煽動，就對羣衆的影響來說，已經發生帝國主義統治的危險——呢，西門委員會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指定了。

關於這一委員會的顯著的事實就是牠的七委員，都是英國人，代表三個英帝國主義的政黨，保守黨，自由黨及社會法兩士黨（即工黨）。其報告，經過兩年半的『工作』，他們現在才發表，他們誇張地宣稱『在全部基本事實是一致同意的』，『沒有發見異議的紀載』。換言之，這一帝國主義的委員會的兩位『勞動』，委員絕對

同意於帝國主義的自大與虛偽的玄妙的口語，同意於持續使英國資本致印度於死命的那種建議，同時他們的領袖，麥克唐納爾，正在給印度民衆以每日之炸彈，坦克車和機關槍等實際的示威，而使之成爲『在印度的責任政府的逐漸實現』的工具。

西門委員會的報告，在其序論中，明顯地指出了對印度的各方面的『統治計畫』，是遵照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日蒙特哥（Montagu）當時之印度大臣所發之訓令。這個訓令是命令以戰爭來直接壓迫，『國家的任何政黨不得提出反對的意見』。蒙特哥所設計的『統治計畫』，工黨爲什麼完全同意呢？他宣稱：

『印度政府所完全同意的英國皇家的政策，是使行政的各部门與印度人民的聯絡程度增高，和自治關機的不絕的發展，這個目的是印度責任政府成爲大英帝國的整體的逐漸實現』。

一九一七年自由黨帝國主義內閣所設計的政策恰恰是工黨會議所採取的政策；在這裏我們還見到有趣味的事情，就是甚至帝國主義的訓令的語言是復現於五月十二日第二國際執行委員會柏林會議通過關於印度的決議案之中了。

這一政策首先認爲大英帝國有人類發展的最後決定權，又說這是永世不變的和不能毀滅的；其次，他說印度注定爲萬世不變的帝國整體的一部分；又說由『與印度人民增進連絡』，責任政府要在『行政』中，就是在榨取與壓迫的工具中，逐漸實現萬世不變的帝國整體的一部分。

這些可笑的妄論都是以西門報告爲根據的。現在所發表的文件甚至沒有說得上有新的或創作的價值，也沒有供給任何討論的材料——那曾經不是過去五十年每當印度自由問題發生的時候帝國主義強

盜的藝能的材料。沒有一節不是抄自政府的出版物，或不是引用帝國主義行政中官吏的口頭禪。

這個報告以兩卷發表。第一卷於六月十日發表，是研究『印度問題的情勢』，等二卷於六月二十四日發表，內容是這個委員會的結論與貢獻的意見。第一卷內容是必需製造壓迫的帝國主義的毒語，就是印度不適於自由，所以必需英國來統治。

在這短短的一篇論文曝露西門報告所製造的一切妄語是不可能，雖然這些妄語不是什麼新的創作，而且已爲印度民衆的廣大的騷動及其在不可壓制的獨立運動的戰爭中所表現的團結與堅決詳詳細細地回答了。但是必須要指出的，西門報告所引用的『統計表』，主要地來自一九二一年的戶口調查，乃是有意地用爲迷惑笨伯的。這就是帝國主義者所引用的統計表：

人口三萬二千萬，分爲各種種族與常在戰爭的宗教團體，如二千二百萬印教徒，七千萬回教徒，三百萬塞克教徒，三百萬基督教徒等等；印教徒中有五千萬巴喀族，不幸在一千四百萬婆羅門教徒殘餘的社會苛政之下；有二百二十二種言語；二千三百種族；只百分一四·四的男子與百分之二的女子受了教育等等。結論：撤回英兵而讓這些貧民互相撕殺是罪過，因爲那供給百分之六十二的帝國軍隊的Panjab人會攻擊『無武裝』的種族而破壞『自治的印度的和平統一』。

我們很容易看出這些戶口調查的統計是錯誤的，而呈現這些統計的方法也是有意心的假造。例如，戶口調查上說有二百二十二種『語言』，這個統計是爲許多沒有研究戶口調查的報告的重述。實際上，在印度還不到十三種語言，這是帝國主義的欺騙手段，以冀加重

種種的壓迫而表示印度統一的不可可能——除非一致地奴役於英國的統治。我們這裏所引用的語言種類的例證是帝國主義以之爲其存在的口實的典型的實例。但是印度的民衆深知他們握得政權的時候語言問題是很容易解決的。

西門委員會的報告所有的主要的論據是：印教與回教的宗教上的戰爭；毫不可犯的種族制度；『不可捉摸性』；宗教的少數派；普遍的不識字；諸封王；外敵；內部的無秩序；婦女之可怕的狀況等等。

我們在這裏不能討論這些問題。但是我們略略的引證就可以證明這些問題的有趣味。

關於印教與回教的衝突，西門報告自認，自從對兩個宗教社會的選民分離制被一九一九年『改良法案』在各縣，市，省及中央立法

機關施行之後，情形已經更行惡化了。『實在的原因』，西門報告說道，『是政權的與政權所授與的機會的爭鬪』。

我們要曉得只有百分之二·二的人民——只代表有財產者——有投票權，所以明顯的，帝國主義的政策，有意地製造這種由警察的詭計的幫助來，慫恿衝突的制度。

但是西門報告於不謹慎時說出實話來。牠說『大工業的工作』是聚合許多不同的種族與宗教的人『在工廠與鑛廠中』，在那裏這些差異性不存在了。同樣，對於那些屬於這兩種社會的 Orda 地方的二六〇大地主，西門報告認為『他們的共同利益超過了宗教的差別』。換言之，儘管帝國主義的陰謀詭計，橫的階級路線超過了直的種族與宗教的路線。

這個報告盡力地討論人民缺乏教育的問題，和農村的狀況，孟買

及其他各城市的工人的可怕的居住的情形，農民的負債等等。但是西門委員會的『工黨』委員沒有一個字表示這些事實與帝國主義間的關係。

西門報告的最可恥的部分就是討論在印度的軍隊問題。在說到印度的『防禦與治安』，編者寫道：

『印度應當熱心地負起經常的負擔而準備對付牠的西北邊境的真實危險，這是在自治屬地中無與比擬的事情。印度的全部歷史曾經忍受外國侵略者的種種侵略，這些侵略者由西北及他處的徑路強入於印度了。』

所以，來自海外的帝國主義強盜現在駐紮在那裏保護印度以防『外來的侵入者』。自然偶然的，西南大山中的夾谷與徑路對於這些強盜是有用於相反地侵入阿富汗與其他最不利於帝國主義的國家。

單就印度對於西門報告的接受來說，民族主義的機關報謂西門報告爲一種侮辱，民族主義的領袖應當拒絕其爲與政府磋商의 根據。不只是國民大會領袖，就是許多不屬於大會的溫和派領袖都會經拒絕西門委員會來印度考查實際的情形，誰料他們今天會公然地接受西門報告，他又要求圓桌會議不要提及這個報告。

關於西門報告的第二卷將於下章詳細說明。

第七章 西門報告之第二卷與印度前途

西門報告的第二卷，如期於其預定之六月二十五日出版了。第一卷的內容是關於印度之「事實」，馬上在英，印，及美國售出數千册。英國政府最重要地是使西門報告爲美國人所共知，因爲美國商業與工業資本家的有力的部分曾經有過反英和親印的傾向。Manche-

ster Guardian 報謂重要的美國報紙以很大的篇幅專用於西門報告，又謂『這個報告幫助了和增加了在美的很多同情英國的好朋友』。

在第二卷中具體表現出了的『組織改變』的建議，就是形成帝國主義的統治的無限的加強，其中沒有一句話是表示印度將獲得『國內的自治屬地地位』的前途——那國民大會的領袖認為是不可再減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這一卷分爲十二章。第一章稱爲一般的憲法原則，內容就是英國政府對於其統治的人民所常用的話。據稱，印度的根本憲法應當是聯邦制，那就是，有朝一日，『無論那一日如何遙遠』，英屬印度的各省與爲封建的印度封諸王所專制地統治的各封土，都聯合起來爲一個『在帝王保護之下的聯邦』的時候，——但是僅就本身自由的印度諸封王會希望『與英屬印度發生密切的關係』。這時，『當

印度進步到完全自治的道路時，則對政府的基礎的保持與效力就要作準備』乃是『一件根本必要之事』。這個意思在後面幾章中更爲明顯。

第二章中，專門討論省政問題。在一九一九年 Montagu Chelmsford 改良計畫之下，省政由省執政者與行政會議兩方面來管理。也有印度人充當長官，不過只是移交些教育，衛生等等事項給他做，他們對省議會負責；而其他事項都在行政官吏的手中，他們都是英國人，不對議會負責。這種制度現在已經廢止了，省議會擴大了，省的『行政機關』對立法機關負責，立法機關由有選舉權者選舉之（選舉權逐漸提高到人口百分之十）。這個新制度稱爲省自治制，但是省長是有處理他的屬僚的事務與獨斷地處理一省的緊急事件之特權。

至於選舉，特別要使大地主得到保障，就是如果他們方面的當選者沒有如他們現在所享有相等的數量選入議會，省長會以委任的方法來使地主方面的數量充足。勞動代議士的問題保留由各省省長決定，『如果相當的議員數是有益的話』。（相當的議員數的意義自然是說 *Joshi* 與 *Shiva Rao* 式的）。由上所述，村鎮選舉制度被保留了。回教徒與印教徒，各自有選民，在 *Punjab* 的塞克教徒與一切『歐洲人』——自然意思只是指英國人——也是一樣的，同時所謂受壓迫的種族與其他社會是由省長所委任的議員來代表。

第四章討論中央政府。目前的立法會議應廢止，而代以『聯邦會議』，由二五〇至二八〇之代議士組織之，其選舉不得直接由各選舉區，而應以比例代表制的方法由各省議會選舉之。總督應為政府之首，直接對印度大臣與英國國會負責，由行政會議輔佐之而不對

聯邦會議負責。爲推行帝國主義政策，內閣之某一特別閣員應受命爲『會議的會長』。此外，軍隊的總司令不得爲總督會議的委員之一。

第六章是主張緬甸馬上劃出印度之外。緬甸的總督不應屬於印度總督的統治，而可屬於英國內閣中之殖民大臣管理之下。西門委員會希望『畫出的緬甸的新憲法，如像印度的一樣，會是達到更完全的自治的路上的一個階段』。（在這裏我們要注意在英帝國主義的語氣中所謂『完全』實是不完全，因爲還有『更完全』與『最完全』的那一回事）。在這裏我們還要指出這話的意義注重在『印度對於緬甸的努力的重要性』——這必要在新憲法中特別保存的。

第七章討論印度的諸封土，在較遠的將來的某日，這些封土會是印度聯邦的成分，但是在目前應勸令其對於有關於『英屬印度與封

士』的共同事件作永久的協商。爲這個目的，應設立一個三十名委員的『大印會議』，其中十名代表諸封土。這個會議只有協議之職。

第八章討論財政，幾種新稅創立了，以冀增加中央和各省的收入，其中之一個建議是豁免農業進款的所得稅的廢止。

第九章討論所謂『治安的服務』，那就是，繼續存在於全印的印度文官與警察，其權利與特權要『妥爲保全』。

第十章是規定一切高等法院的行政管理應歸中央政府，此後不應再歸省政府。這種設計的目的是要實行帝國主義裁判制度的行政的統一。

其中之最重要的兩章就是那討論西北邊境（第三章）與防禦與治安（第五章）。英國軍隊與英國官吏都被認爲是印度的安全所必要

的，所以軍隊不應在印度政府之下，而應『在那必然是總督與總司令協同行動的帝國統治之下』。現在每年達四千一百萬鎊的軍費應由印度的歲入支出，這不得由中央立法機關來票決，而由總督直接撥給。

西北邊省，為本身及邊外諸部落區域二者的管理，應成立一個評議會，但是西北邊境與東北邊境二者都應視為帝國之特別區域。還有一個明顯的表現，為新戰略而敷設的鐵路在西北邊境應建築——連接着暹羅與中國的邊境，又軍事的準備是應極力地的擴大。為制止『擾亂和平與保護治安』而要求使用軍隊的各省對於軍費應由各該省歲入支出。

總而言之，帝國政府盡力擴大他的權力，盡力製造內戰。由村鎮選舉的保留，帝國主義的陰謀前此所挑撥的宗教的騷亂，現在為省

議會的擴大與選舉權的增多更行加厲了。由所謂省自治的採行，各省的居民會更強烈地有興味於本省的事務，各省的敵視會要發生而引起『孟加拉省是孟加拉人的』『彭加布省是彭加布人的』等等的口號。中央立法機關由省議會的選舉，是分離他們與選民羣衆的接觸，同時那由聯邦會議指定總督行政會議的希望成爲誘致陰謀與帝國主義政策的擁護的一種賄賂。

那破壞民族解放運動的政權是由這一事實來增大的，就是各省的立法機關此後會發生地主與資本家之過優勢的比例，而『法律與秩序』會在各省由這個集團引用出來的印度官吏來維持，在警察認爲不能擔任的時候，幫助他們的是帝國軍隊。

在俾路芝斯坦，西北邊境，東北邊境的軍事準備極不負責地推進，印度諸封王所統治的諸封土，由更祕密地勾引爲完全帝國主義的

機械，不僅會加強英國對帝國戰爭的準備，而且準備無數的反動軍隊以對羣衆民族解放運動進攻。

由上所述，西門報告第一卷的全部意義只是在於製造印度的內亂與加強英帝國主義對印度的統治。

第八章 最近之北夏華事件

北夏華事件是印度民衆最近最英勇的反英運動。儘管英帝國主義殘酷的施行飛機炸彈政策，他們的反英戰爭還是猛烈地進行着。無論改良派怎樣作分離運動，他們還是團結一致的。

關於這次事件，我們特別要從路透社——英國的新聞宣傳機關——來證明。八月十日申報載：

『路透社九日北夏華電：昨夜阿福利狄人有大舉進攻之勢，

但未成事實。星期四日進至距城不足一哩之敵一隊。復回哈巨里平原。……」

十一日申報又載：

「路透社九日北夏華電：熟悉西北邊界情形者謂，阿福利狄人之進窺北夏華，未可視為部落作亂。敵衆大都爲少壯青年，顯爲此間奸人所誘惑，……北夏華陸軍與航空軍力量尙厚，可以抵制任何猛攻。除戍軍外，當局現僅用兵四大隊……。敵兵無論如何其數不過數千，而阿福利狄族散居北夏華東南各村者，亦僅數百。邊界熱氣，殆不可耐，但航空軍不辭困難，繼續攻散敵衆。星期三日以來，常用六隊飛機擲拋炸彈，一日之內曾擲落炸彈六千枚。」

「路透社九日西謨拉電：今日北夏華消息，謂進犯北夏華與

勞希拉間之敵衆，現漸退散。星期四五兩日有五十餘架飛機，在敵境擲落炸彈。」

由這三件消息可知北夏華事件的嚴重，阿福利狄人反英戰爭的猛烈，否則英帝國主義不得說『常用六隊飛機』共『有五十餘架』於『一日之內擲落炸彈六千枚』。但英帝國主義在北夏華屠殺印人的軍事準備非常充足，牠除了飛機炸彈以外還有坦克車與鐵甲車，牠自信這些兇器可以鎮住印人不得一動，所以『路透社九日倫敦電謂：倫敦官場不重視印度西北邊省之時局，不信界外部落將攻擊北夏華本境；因該處有充分兵力，足以應付外侵，且近來復到有許多坦克車與鐵甲車』。

路透社口口聲聲說這是『部落作亂』，爲『奸人所誘惑』。但是實際上，北夏華事件是印度整個民衆的反英戰爭，我們由下列的消

息就看出來：

申報八月十七日載路透社十五日西謨拉電云：『今日當局發表公報稱，大局至爲危急。敵人利用高長之農作物，以掩蔽其行動……沿山峽與有牆之園圃疾進，英兵正施攻擊，惟難奏功。村民顯以糧食住所供給敵人……』。又該社十二日北夏華電：『亂事中心點現漸移至巴拉紀那與科哈特兩處，該處哇拉克賽族已與刻由北夏華退去之阿福利狄族相結合……』。所以由帝國主義自己宣傳的消息就可以知道這次反英戰爭不是那一部分人民的行動。這個由下列的一項消息更爲明顯了：路透社十六日西謨拉電，『北夏華戒嚴令規定，凡與敵人往來，或阻礙政府軍事行動者，須照印度刑法治罪。而窩藏或保護敵人者，須受十年以下監禁，或兼科以罰金』。這是表示民衆都在參加反英戰爭，否則何得說『與敵人往來』及『窩

藏或保護敵人』者，尤其是『阻礙政府軍事行動』者，都應處以嚴刑和罰金呢？

這時，改良派又怎樣呢？申報八月十日載：

路透社八日蘇拉電：『村鎮官吏一百九十人，前曾於非武力反抗運動開始時自行退職，但現撤銷辭呈』。

路透社十一日浦那電：『印度國民大會領袖尼赫魯（即奈魯）父子今日由阿拉哈已被移往葉羅達獄中，俾與拘禁該處之甘地晤商』。

在北夏華反英運動正緊張時，他們卻復職了。這表示一方面他們的辭職不能欺騙民衆，另一方面在北夏華事件緊張時期帝國主義正需要印人來幫助鎮壓，他們既爲帝國主義的走狗，復職來幫助帝國主義是義不容辭的。

奈魯父子（英人）是英國的偵探，他們參加國民大會完全是想來欺騙印度民衆，所以帝國主義特別優待他們，就是在獄中——他們的入獄是帝國主義玩的一套欺騙印度民衆的把戲，以使信仰他們是爲印人奮鬥而來印的，所以政府要拘捕他們——也可以由東移到西而與甘地會商。會商些什麼？恐怕是英帝國主義傳與奈魯父子的新欺騙的方法，而由他們達於甘地遵行罷。

從來英帝國主義對於印度人民的手段是十二分殘酷的，而獨對甘地這樣的客氣，使其在獄中還能與那兩位國民大會的領袖——奈魯父子——會商『印度獨立運動』的『大計』。甘地的行爲不得不令人有所懷疑。

英帝國主義的宣傳機關宣佈這班改良主義者的死刑了，叫我們無法替他們辯解。

——完——

